

中苏友好宫架起一座桥

1956年3月15日，解放大道春光明媚，中苏友好宫落成开放，武汉新添一个大型公共空间，一举跃升为新地标。同期，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雄踞四座中苏友好宫，一时并称“四大都会”。

一座建筑驰誉天下，迅速拔高城市形象，让市民的自豪感拉满。中苏友好宫—武汉展览馆—武汉国际会展中心，70年潮涌浪迭，历经更名和重建，留下的文化记忆不曾磨灭。

本刊今年第二期，85岁老人张智海《就读武汉市实验小学的美好时光》一文，回顾当年作为少先队员代表到友好宫作客，与苏联展览会主任斯莫里扬诺夫及石油、矿山、教育等方面的专家联欢，至今收藏着两位专家的中俄文题词。更多的武汉伢，在友好宫时光变幻的展览中长大，还把对门的中山公园串联为游玩的“标配”，一次次留影的碎碎念念，漾开一种被回顾的美好。

中山公园的门楼坐不住了，由“民国风”改建为“苏联风”，两边建筑美学统一，构造出气象恢弘的城市中心。每逢盛大节日，游行队伍齐刷刷正步走，震撼放飞的白鸽，回荡江城前行的足音。

武汉中苏友好宫没有尖塔高耸，但主体建筑凸形布局，21个展览大厅，23085平方米，体量规模最大。六根挺拔的立柱撑起主楼，顶部檐楣红旗簇拥五角星浮雕，两旁伸出双臂转折绵延，怀抱出几乎130米见方的广场，数万人集会，大场面爆款。广场中央，一座莲花形喷泉水池，沿边蜿蜒16个花瓣，水柱迸射20多米高，每逢欢庆之夜彩灯开启，与空中纷披的礼花争奇斗艳。广场主楼前，屹立两座苏联男女学生雕像，那是武汉伢对外国人的最初认知，激起过遥远的遐想。

推开雕花木门步入宫内，八角形中厅一通到顶富丽堂皇，彩绘藻井垂下三重水晶吊灯，俄罗斯风情浓郁。其后的主展厅穹隆纵深向前，一眼可见列宁、斯大林雕像并排而立，折叠着时代的一页。

1956年5月5日，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首开先河，异国色调的精品荟萃，提供现代先进标杆，引发学习借鉴热潮。两个月间，观众230万人次，出售商品110万件，好多武汉伢可以炫耀家中有了时髦的“苏联货”。随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展会纷至沓来，日本工业样品展、丹麦电子仪器展也激起浪花。凭着一张日本广告图片，武汉通用机器厂仿制出第一台手扶拖拉机，由此转产为著名的武汉柴油机厂。1958年，毛泽东主席前来视察，欣然与手扶拖拉机合影。及至改革开放，国际电视设备展、世界摄影百年展、美国俄亥俄州贸易展……多彩世界目不暇接。

中苏友好宫，堪比长江大桥飞渡天堑，架起另一座大桥连接环球，武汉的国际知名度也大为提升。

回想1961年3月，中苏友好宫四楼圆厅辟为武汉电视台演播室，当年首次转播国庆节庆祝大会和游行实况，让外地观众一览武汉新貌。今年3月，武汉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武汉家博会，以全产业链品牌“空前巨献”，不断切换着新的频道。

(简桦)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陈诗亮

副主任：朱向梅 刘洪波 董菲

杨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海涛 王军振 王四清 刘海燕

朱永利 李军 张智勇 李文洲

张冰峰 陈红英 林伟 胡蓉

唐云峰

主编：阮祥红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桦

本期责任编辑：章旷怡

编辑：许濛 刘玮

封面设计：王鹏

阅城偶记

<<<< <

1 中苏友好宫架起一座桥 / 简桦

时代年轮

<<<< <

4 1926，董必武创办《楚光日报》《汉口民国日报》

/ 罗建华

风雨同舟

<<<< <

12 公益路上的九三情怀 / 姜志权

九城同心

<<<< <

16 故园放歌：董继宁的艺术人生与咸宁情怀 / 柯文翔

委员天地

<<<< <

21 从技术出发，向责任走去 / 陈婵

25 一个海归青年的十年乡村路 / 尹雨龙

目录

CONTENTS

商聚汉皋



28 造价人的城市脉搏与时代缩影 / 吴宇宏

人物述林



33 父亲张良皋：建设武汉显身手

/ 张眺（口述）雷敏功（整理）

40 笔墨人生七十载 听鸟问花未了情

/ 魏金修（口述）银华（整理）

45 张之洞幕僚程颂万办洋务 / 刘飞

都市寻踪



48 江汉关博物馆建设纪略（下） / 李笙清 彭建

53 武汉航空轨迹追寻（七） / 刘宝森

扫街探疑



59 洪山摩崖石刻桃心“寿” / 张剑 宋贝

往事漫忆



63 倒口湖，岁月嬗替的故事 / 肖萍

主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28日

定价：8元

地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246号

邮编：430010

电话：(027) 82220669 (传真)

E-mail: whzxwzsl@163.com

1926，董必武创办《楚光日报》《汉口民国日报》

◇ 罗建华

轮印：100年——1926年3月24日《楚光日报》创刊，11月20日《汉口民国日报》创刊，均由董必武创办和领导，为大革命推波助澜，发挥舆论引导的独特作用。今年3月5日，董必武诞辰140周年。

汉口江汉路繁华热闹，商铺林林总总，人流熙熙攘攘，游客很难注意到，两家百年报社旧址就在身旁。一栋带天井的两层小楼，一幢带圆堡的四层大楼，曾经入驻《楚光日报》《汉口民国日报》，在大革命时期叱咤风云，留下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的新闻从业足迹。

《楚光日报》：灰色面孔坚守红色阵地

从中心百货大楼朝循礼门方向漫步，江汉路最后一个十字路口，左边称江汉四路，右边称铭新街。

1926年3月24日，《楚光日报》创刊，社址先在花楼街洪益巷、张美之巷，后迁至锦春里2号，即今天的铭新街3号。

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为探访“江城红色传播地图”，笔者驻足在江汉路与铭新街交汇处，但见两栋西式联体小楼并排而立，门牌却是1号和5号，3号在哪里？

从5号旁的里份门洞拐进去，发现3号隐身于1号之后，为独栋两层小楼，比临街的1号、5号多了一个小天井，院门一闭，偏静安全。一边隔墙是汉口棉花出口业公会，一边紧邻江汉路商铺的背面，后门可通向泰宁街2号《汉口民国日报》，再过去便是京汉铁路旁人来人往的小街，方便转移。两家报社形成前后相守、并肩战斗的格局，随时应对不测。

2024年再度探访小楼，里份口门洞的墙上增加了一块“楚光日报旧址”铭牌，标记为“不可移动文物”，为之欣然。



楚光日报旧址（左）及临街的里份口（右）

《楚光日报》由董必武化名“郭炯堂”登记，名义上属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领导，实际主要由武汉党组织负责，是共产党领导下创办的第一份最早公开出版的日报。董必武任社长，宛希俨任总主笔（主编），龚孟贤、刘竹贤、祖山竹、秦君侠等工作人员皆是共产党人。

为顺利通过登记审批，《楚光日报》报名不大张扬，只在表明身居楚汉之地，但亦暗寓传播光明之意，以灰色面孔坚守红色阵地。

董必武晚年回忆：“一九二六年我党在汉组织过公开出版的《楚光日报》，内容开始不完全拿出我们的主张，在个别问题、个别论点则按照党的原则表达。当时不那样做，反动的统治阶级就不让我们公开出版。一出版就拿出我们的全盘主张，报馆就会被封闭。”

深知北洋军阀的残酷无情，董必武确定“求得生存，站稳脚跟，取得阵地”的办报指导思想。创刊初期，为应对新闻检查，他事必躬亲，从撰稿、选稿、审稿到设计版式，无不谨慎而为，以避免因激进而遭查禁。

尽管恶剑高悬，董必武与陈潭秋轮流执笔撰写评论，分析政治形势，启迪革命思

想，把握舆论引导。同时，“慎重而巧妙地选择新闻”，传播共产党主张，介绍苏联社会主义新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欺压。1926年6月9日，在头条位置纪念六一一血案发生一周年，果敢提出“收回租

界”“撤销领事裁判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口号。看到军阀吴佩孚横征暴敛，发表《复验红契与民间疾苦》社论，予以揭露抨击，为民伸张正义。

驾临惊涛骇浪，《楚光日报》如同一条小船，凶险如影相随。

《武汉市志·新闻志》记载，军阀吴佩孚因《楚光日报》揭露其“乱发官票”“盐斤加价”，下令出动军警逮捕宛希俨，封闭报馆。

《武汉近代新闻史·大事记》1926年8月24日记载：“汉口警察厅当天上午突派武装警队30余人，前往汉口张美之巷，将《楚光日报》封闭。社中职员因事外出，故无人被拘。”

董必武作为参与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元老，在社会上享有较高威望，人脉资源丰富，经四处奔走多方营救，宛希俨方得以出狱。1926年10月，北伐军进军武汉，《楚光日报》得以复刊。

革命形势高涨，暗流也涌动不息，《楚光日报》总体实行迂回战斗，“采取国民革命主张，对工人与农村，据实报道”。贴近工农大众和青年学生，反映疾苦，表达诉求，启发觉悟，鼓舞斗志，将革命主张融入新闻



《楚光日报》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佼佼者，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最早公开出版的一份报纸。

《武汉近代新闻史》还有一笔：

《楚光日报》总主

笔宛希俨出任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宣传部长时，“发起组织新闻记者联合会，并自任领导之职”，旨在“宣传革命主义、统一舆论、发扬民众运动”。新闻记者联合会由《楚光日报》《汉口民国日报》《革命军日报》等报社共同筹备，于1927年3月20日在血花世界（今民众乐园）总理纪念堂宣告成立，成为全国新闻界较早的同仁组织。

笔宛希俨出任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宣传部长时，“发起组织新闻记者联合会，并自任领导之职”，旨在“宣传革命主义、统一舆论、发扬民众运动”。新闻记者联合会由《楚光日报》《汉口民国日报》《革命军日报》等报社共同筹备，于1927年3月20日在血花世界（今民众乐园）总理纪念堂宣告成立，成为全国新闻界较早的同仁组织。

因此，《楚光日报》虽是四开小报，也在万马齐喑的武汉报界中脱颖而出，深为大众欢迎，也为政界青睐，发行量达7000多份。

《汉口民国日报》：公开亮剑担当中共喉舌

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董必武另行着力筹办《汉口民国日报》，将《楚光日报》交给国民党汉口市党部主办，由共产党人秦君侠任总主笔，继续发挥“在当地群众间的一种公开日报的作用”。

董必武在创办《楚光日报》之前，优先考虑的是创办《汉口民国日报》，其背景是《上海民国日报》倾向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必须有一份报纸与之对垒叫阵，并逐步取代它而掌握舆论主导权。

面临国民党右派对国共合作的一步步破坏，《楚光日报》敏锐觉察到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迹象，立即报道发出警示，坚守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操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统一本党政策案》“分共”。《楚光日报》毅然发表宣言曝光其本质，号召民众奋起粉碎反革命逆流，终遭停刊。

1926年1月1日至20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与会共产党人达百名左右，联合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作出继续贯彻孙中山遗嘱和三大政策的决定，并谴责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以开除、警告处分重创西山会议派的头面人物。董必武因势利导，在全会提议创办《汉口民国日报》——报名源于1912年曾有一张反对袁世凯而遭查封的《汉口民国日报》，借此继续传承其革命性。全会认同“汉口应设党报”，但仅是办一份

短短一年四个月，《楚光日报》出版400多期，满纸风云变幻，已成珍贵文献，在革命报刊史和新闻传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新闻研究学者袁继成《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武汉地区的新闻事业》一文认为：《楚



汉口民国日报社址的旧照与近影

小型报纸，经费每月只有 840 元，因而先办《楚光日报》探路。

1926 年 10 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创办《汉口民国日报》的条件日益成熟，董必武会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和国民党湖北省、汉口市党部，三家一起筹办。11 月 20 日，《汉口民国日报》在歆生路忠信二里 4 号（今江汉路泰宁街 2 号）国民新报大楼问世，编辑部设在泰宁街与铭新街之间的德安里 1 号。

董必武作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以董用威之名任《汉口民国日报》社长出面负责，毛泽民任经理总揽经营事务，宛希俨、高语罕、沈雁冰（茅盾）先后接任总主笔（主编）。20 多位编辑、记者大多为共产党人，知名者有石信嘉、孙际且、宋云彬、马哲民、李达可、倪文海等人。

从铭新街往泰宁街走百十步，便是建于 1922 年的国民新报大楼，原是北洋军阀报纸《国民新报》所在地，1926 年作为敌产由北伐军没收，楼房和机器正好为《汉口

民国日报》所用。抚摸大楼墙上镶嵌的“汉口民国日报旧址”铭牌，百年云烟一一闪回眼前。

如果说《楚光日报》是地方性小型日报，那么《汉口民国日报》乃全国性大型日报。据《武汉市志·新闻志》记载：《汉口民国日报》每日出版对开 3 大张 12 个版，其中 7 个版刊登国内外要闻，另辟半个版

文艺副刊《国民之友》。1927 年，又扩大为对开 5 大张 20 版，每遇重大活动还另行加张，内容更为丰富。创刊时发行量 4000 份，最高时突破 10000 份，报摊时常供不应求。《汉口满街卖报声——旧中国武汉报业史稿》一书披露，《汉口民国日报》曾一连数天刊发启事，称“本报每份定价 3 分，合钱 100 文，并未加价，外间竟有售 160 文者，请购阅者特别注意为祷”，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汉口民国日报》担当中国共产党喉舌，公开宣传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董必武实现了多年心愿。武汉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编的《往事如歌（卷七）》，收录一篇沈雁冰回忆录《〈汉口民国日报〉的一些情况》（胡传章、程安辉 1979 年 7 月 17 日在北京记录）：“1927 年元月初，我到武昌任中央政治军事学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4 月，调到汉口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笔。”“《汉口民国日报》是董老创办的，约在北伐军占领武昌后创刊。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



大革命时期沈雁冰（茅盾）在汉口

的机关报，实际上直接受我们党中央宣传部的领导，是党中央的机关报。”

然而，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严重影响大革命的深入，也严重干扰《汉口民国日报》的运作。沈雁冰在上述回忆录中说：

“陈独秀到武汉后，出于右倾机会主义思想，骂两湖工农运动过火。有一次，他找我谈话，说《汉口民国日报》登工农运动的消息太多，以后要少登。我就向董老请求怎么办，董老很坚定地说：‘不要理他，继续登报’。董老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是旗帜鲜明的。”

“人文武汉”文史研究者田联申，也发掘了一些相关史料：沈雁冰任主笔后进一步改版，调整版面结构，加大新闻分量，在上海、北京、广州、南昌、福州及莫斯科、日内瓦、伦敦、纽约、巴黎等地延聘特约通讯员，建立新闻信息网，信息量增多，时效性提高。这一阶段，专辟《紧要新闻》《各地通讯》，前者刊登国内外重大新闻电讯、本报专访和特约通讯等，后者作为其补充和延伸，对重大事件进一步解释分析。此外，还增设《本市新闻》《本省新闻》，关注地方动态，及时反映荆楚大地动态。

长江日报老记者李洁龙编著的《汉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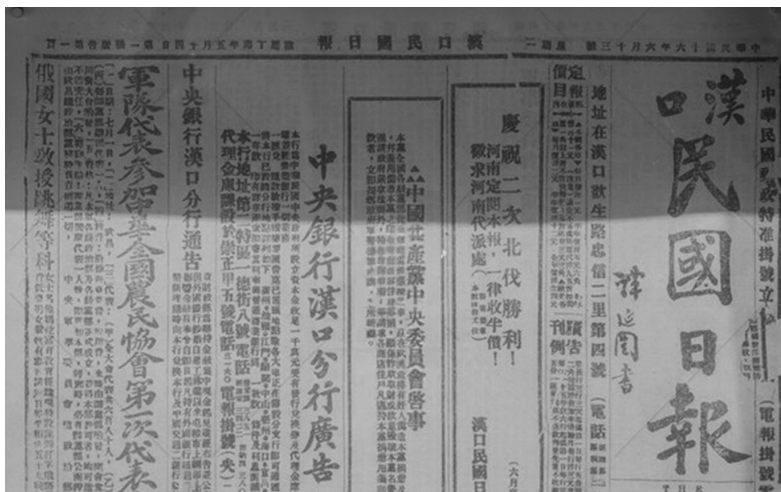
满街卖报声——旧中国武汉报业史稿》，详细盘点了《汉口民国日报》8个月（1926年11月20日至1927年7月17日）共232期的出报状况，其中一节标题是“表现大革命激浪千叠的所有特征”，概述其“政治新闻主导了版面，几近垄断，重大新闻几乎天天扑面而来”。

确实，从版面安排和报道内容看，《汉口民国日报》引领舆论，发表国共两党宣言、中共五大宣言、二次北伐誓师宣言、第一次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反英示威大会决议、反英反奉宣传大纲等重要文献，刊登陈独秀、李立三、张太雷等中共重要领导人的演讲文章，悼念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国际共运领袖和在北京遇难的李大钊，纪念孙中山、廖仲恺逝世周年，报道北伐进军、国民政府迁汉、收回英租界等重大事件，开辟《农工消息》《民众运动》《光明与黑暗的斗争》等专栏，有力反映和影响大革命的发展进程。

董必武也在报纸上发表演讲，如1927年4月5日发表《我们目前的大斗争》，直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的征兆，揭示国民革命面临的危机：“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很严重的时期，不但是国际间的危机，而且是国内的危机，更使我们痛心的就是党内的危机。”

果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武汉近代新闻史》“大事记”4月14日记载：“《汉口民国日报》遭到国民党右翼攻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八人在‘护党救国’的通电中，攻击‘《汉口民国日报》一月以来之所揭载，莫非动摇基础，毁坏本党中心人物信仰之记载。’”

随后七一五“宁汉合流”，大革命夭折，《汉口民国日报》清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立场走到反面。7月19日，董必武愤然发表声明辞去社长职务。7月29日，上海《申报》报道说：“号称唯一党报的《汉口民国日报》，亦公然载反共谋叛之事实。”不久，桂系将领胡宗铎将之改组为《湖北民国日报》，大肆为反共张目。

比之《楚光日报》，《汉口民国日报》存续时间更短，但《中国共产党武汉史（1919-1949）》评价说：“它开辟多种专栏，大量刊登工农运动和妇女解放的消息报道，如实地记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运动，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武汉政府时期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革命先驱：峥嵘岁月闪亮办报足迹

董必武德高望重，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生多方征战功勋卓著，在新闻事业中也留下闪亮足迹，《武汉近代新闻史》“人物小传”为他列有专条。

早在投身革命之初，董必武就敏锐认识到，革命活动应从宣传新思想和培养革命人才入手：“一曰办报，二曰办学”“唤醒群众、接近群众的最有效的方法”。

1919年春，董必武与张国恩、詹大悲、李汉俊等商量筹备《江汉日报》，以求“不为军阀所控制，敢为人民说话”。据《董必武：从清末秀才到无产阶级革命家》介绍，他从孙中山所给的100元川资中拿出40元钱印刷股票、章程、宣言等，促使大家分头筹募基金，却因筹款困难未果，转而下功夫筹办私立武汉中学。

1920年3月，武汉中学开学，董必武联系恽代英主办的利群书社，为学生提供《新青年》《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同时指导武汉中学学生会创办《武汉中学周刊》，想方设法建立舆论阵地。

1920年8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1921年新年伊始，董必武即与黄负生、刘子通等创办《武汉星期评论》，传播新思潮，抨击旧制度，倡导改革教育与改造社会，推动民众运动开展。董必武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写出不少短论。

1923年，二七大罢工遭到镇压，《武汉星期评论》被迫停刊，革命进入低潮。董必武不甘失去舆论工具，策划创办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刊物《武汉评论》，于1924年10月11日问世，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抨击封建军阀反动统治。1925年，五卅运动的浪潮激起震荡，《武汉评论》出版上下两期《反帝国主义运动专号》，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及手段，系统论述反帝运动的意义和前途，在江城引起强烈反响，发行量突破万份。

1926年，董必武不仅创办《楚光日报》《汉口民国日报》主持战斗，还在1927年6月创办的《农工日报》兼任社长形成合力。

时光之箭穿梭，瞬间划破十载。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武汉成为战时首都和抗战中心。董必武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重回江城，在筹建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同时，参与创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

《新华日报》原本报名《新中华日报》，因国民党当局不允而改名。原本准备在南京创刊，因南京沦陷而西迁武汉。先期抵达汉口的董必武，落脚在家乡黄安（今红安）老友阮毓崧修建的安仁里1号，并在邻近的大陆里租用6栋两层住宅，为《新华日报》安家，使之于1938年1月11日呱呱落地。

《新华日报》为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出版的报纸，创刊时董必武代表长江局在全体大会上致辞，形象地宣称“《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嘴巴”，明确指出报纸的特殊使命和战斗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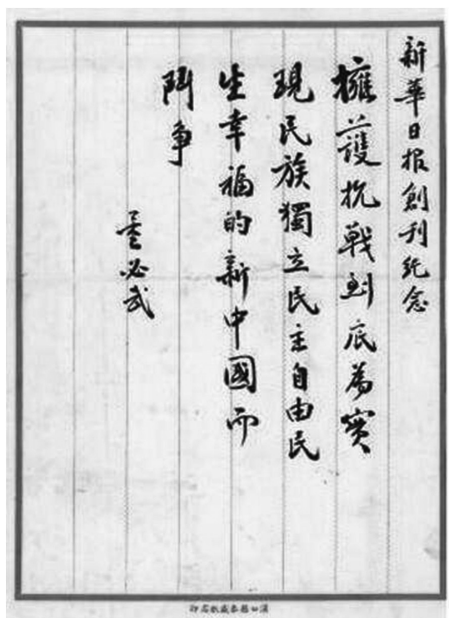
1月17日，《新华日报》创刊不及一星期，就因“触忌汉奸匪徒所至”，一伙社会混混上门捣毁印刷厂，背后主使不言自明。第二

天，《新华日报》坚持出版，回应的是刊发董必武题词——“拥护抗战到底，为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表达强大决心。8月，国民党方面出台“登记社团办法”，以此限制和取消中共领导的抗日进步团体，董必武与周恩来一道在《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抗议，与之进行不屈斗争。

董必武担任《新华日报》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成员，在武汉战火纷飞的9个多月里亲历亲为，并不断发声。董绍壬《烽火征程与使命担当：祖父董必武在抗战中的两次重要事件》（《湖北文史》2025年第2辑）一文说：“在创办《新华日报》的过程中，祖父倾注了大量心血。作为长江局委员，他积极参与报纸的创办与编辑”“他几乎每日为报纸撰写评论文章，笔耕不辍。家乡友人蔡寄鸥曾称赞董必武‘地位较高，但是每月俸禄不过三四十元的光景。新华报上，每天有他的论文。他虽然是五十多岁的人，每天奔走忙，写作忙，没有一刻休息的时候……他的做事精神，的确是让人佩服的’”。1945年初，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到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不忘节约经费，“为《新华日报》购买印刷机”。

董绍壬为董必武长孙、湖北省董必武思想研究会会长，他在文中提到的蔡寄鸥亦为著名报人，辛亥革命后曾任《正义报》《国民日报》主编，解放后任湖北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著有《武汉新闻史》，也在《武汉近代新闻史》“人物小传”中列有专条。

确实，董必武借助《新华日报》传播平台，为世界反日援华大会特刊题词，撰写《回忆第一次谒见中山先生》《对国民参政会的意见》《今年的“九一八”》等重要文章，旗帜鲜明地维护统一战线，深刻阐明抗日持



董必武为《新华日报》创刊题词

久战思想，鼓舞全民族同仇敌忾抵御外侮。

面对日军进攻武汉突破华中，董必武及时在《群众》周刊（1938年第1卷第8期）发表《武汉的民众动员和组织》一文，尖锐指出“南京失陷后国府迁渝，带来某种战时气氛，依然没有把本地民众从积极方面发动起来，这使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占重要地位的武汉，有遭遇北平、上海、南京同样命运的危险”，因而“保卫大武汉就成为目前政治上一个最迫切的任务”，发动组织民众参战“对于保卫武汉，是有决定的意义”，单刀直入，振聋发聩。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工作繁重，仍然与武汉媒体有缘。1961年5月1日，《武汉晚报》创刊，董必武为之题写报头。

2011年，武汉晚报庆祝创刊50周年，我建议铸造一座董必武铜像纪念得以采纳。简朴的庆典仪式上，邀请董必武后人为铜像揭幕，安放在武汉晚报一楼大厅，铭记着老人家对武汉红色媒体的不朽贡献，表达着新闻后学对革命先辈的崇高敬意。



参考文献：

- [1]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 [2] 唐惠虎、朱英主编：《武汉近代新闻史》，武汉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
- [3]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武汉史（1919—1949）》，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 [4] 《新闻界人物》编辑委员会编：《新闻界人物（二）瞿秋白、蔡和森、邹韬奋》，新华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
- [5] 武汉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编：《往事如歌（卷七）——武汉老新闻工作者轶事》（内部资料），2009年11月。
- [6] 李洁龙编著：《汉口满街卖报声——旧中国武汉报业史稿》，中国文化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



罗建华，长江日报社高级编辑

公益路上的九三情怀

◇ 姜志权

人物名片：姜志权，九三学社中央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湖北省委企业家工作委员会主任，汉阳区人大代表，十四届市政协常委，武汉志臻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汉阳区住宅开发公司董事长。

1999年，我加入九三学社。从那时起，“爱国、民主、科学”这六个字，就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我一边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一边积极参与社务活动，履行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责。同时，我也一直尝试把公益之心，融入到日常工作和生活里，特别是通过参与“一线协商”这样的实践活动，将公益精神转化为社会治理的合力。

热心社会公益，从身边做起

因企业发展需要，2004年我从十堰来到武汉。2007年有幸担任汉阳区政协委员，2011年当选区人大代表，同年担任市政协委员。这些身份，对我而言不仅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在九三学社和人大、政协的大家庭里，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一个企业家，不能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更应当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

扶危济困、乐善好施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我也是从一名普通的企业管理者起步，慢慢学着去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去倾听社区的民意，去关心那些需要帮助的群体。我觉

得，能成为一个“有心人”“热心人”，很踏实。

从2007年开始，我资助几位家庭困难的老人养老，也帮助了好几位大学生，直到他们顺利完成学业。2016年，听说汉阳区建桥街大桥社区要建居民活动中心，我赶紧捐赠了空调、电脑、桌椅和娱乐设施，总价值8万多元。心里就一个朴素的念头：希望街坊邻居们能有个舒服的地方，一起学习、休闲、拉拉家常。还有一次，去三医院看望烧伤的妇女儿童，看到他们的处境，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当即捐了两万元，希望能带去一点实实在在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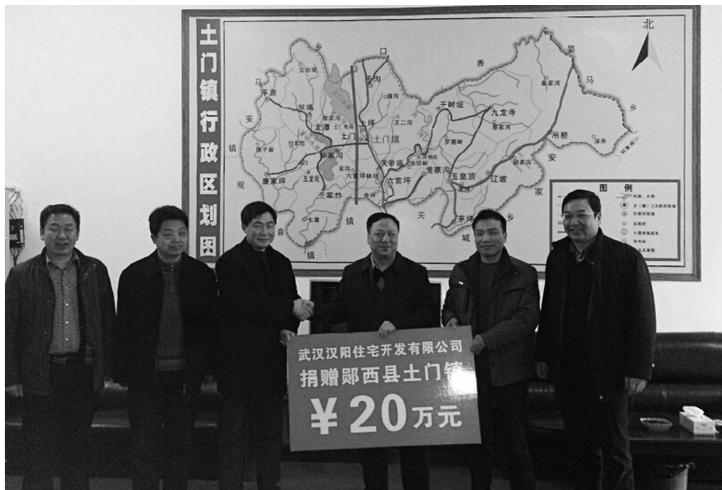
这些年来，我坚持走进社区，了解大家的真实想法和困难。抗洪救灾时，酷暑烈日下，给值守的社区干部送点防暑物资；春节前和街道、社区的同志们一起，提着米、油、牛奶去慰问困难家庭。看到他们的笑容，我就觉得值。此外，我也为汉阳区永丰街的一些社区慈善基金捐了款，希望能把这份互助的精神传递下去。

支持扶贫攻坚，尽一份心力

实施精准扶贫是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是进一步加快贫困地区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出力的地方。

2013年，我了解到十堰郧西县土门镇因为地处山区，发展比较困难，就捐了20万元，希望能为当地的脱贫工作添块砖、加片瓦。

印象很深的是恩施来凤县的老茶村，那是我们九三学社湖北省委的对口扶贫村。我



为郧西土门镇捐款

跟着社省委的领导和工作专班一起去村里考察，坐在老乡的屋前，大家一起聊：咱们老茶村到底该怎么脱贫，发展什么产业才能自己有“造血”功能？我结合自己的所见所想，提了一些建议，并且首批捐赠了10万元作为扶贫启动资金。后来，老茶村的产业有了收成，我特别高兴，赶紧采购了大批农产品，给公司的员工当福利，这样既支持了村里，也让大家尝到了地道的农家味。

江夏山坡街官南村是汉阳区工商联的对口扶贫点，我作为原区工商联副主席，多次到官南村进行脱贫攻坚考察调研，捐赠物资，慰问困难户，还大批量采购贫困户的农副产品，就想帮他们多增加点收入。去年，红安县一个村子要修路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资金遇到了难题，村里负责人找到我，我立刻捐了15万元。路通了，村子发展的希望就更大，想到这儿，我就觉得这钱花得特别有意义。

投身抗疫，责无旁贷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袭来，那段日子，每个人都揪着心。我先后向九三王选

关怀基金、汉阳慈善总会捐款 15 万元，也动员公司员工一起捐款捐物，投入到这场战斗里。我们旗下的物业公司，要为八千多户居民做好防控和服务，那三个月额外支出就超过 135 万元，但大家都咬牙坚持，觉得这是必须扛起的责任。

我还发动支社的 27 位社员，一起向王选关怀基金捐款 3.19 万元。同时，购买 1.2 万余元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去慰问汉阳区大桥社区的困难居民。那时候，一份实实在在的物资，可能就是一家人几天的安心。

疫情形势好转后，复工复产成了头等大事。我们公司严格按照要求做到“五个到位”，在 2020 年 3 月 25 日获批复工。为了确保安全，公司花了十多万元，给全体员工以及施工单位的工友们三百多人，全部做了核酸和抗体检测。大家都说，这笔钱花得值，心里踏实了，干活才更有劲。

后来，武汉市疫情防控取得了重大胜利，城市功能逐步恢复，各个行业有序复工复产，城市恢复了生机和活力。我被九三学社中央评为“九三学社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湖北抗疫一线优秀社员”。这份荣誉，属于所有在那段艰难时期并肩战斗的同志们。

积极参政议政，为民解忧

如实反映社情民意，为党委、政府及时了解民情与指导工作提供第一手的资料，这是职责所在，也是群众的期望所在。我在抓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平台开展的各项视察、调研、民主评议活动，踊跃建言献策。我喜欢往社区跑，去听大家聊家常、出



慰问汉阳区汉琴社区贫困户

行、就业、看病、养老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并转化为社情民意、人大议案或政协提案。

武汉市高架快速路通车里程排名全国前列，但许多高架快速路上的匝道却迟迟不通，像个“断头路”，影响通行效率。关于完善匝道的建议，我提了好几年，直到问题最终解决。还有关于城市地下水管控、城市建设中水土保持的建议，以及提议在“两江四岸”建一座摩天轮地标，这些提案都得到了市里的重视，有的还被列为重点提案。

2021 年，我全程参加了市政协有关大力发展物流产业的专题调研，同专家学者、政府部门、园区港口企业展开多轮研讨，撰写了《关于建设高质量现代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议》并作主题发言，建议加快商贸物流园区、铁路专用线、港口、机场等枢纽设施建设，建设转运衔接设施，推进多式联运发展，加快对外通道建设，强化国际货运网络，加快建设数字化物流、智慧物流体系。

2022 年参加市政协组织的武汉市公共财政民主评议活动，并作《发挥财政工作职能 助力产业转型升级》的主题发言，建议

大力发展政府产业基金，推进新技术、新产业发展壮大，加大财政贴息力度，引导银行贷款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发挥财政增信分险作用，引导银行资金投向实体经济，继续加大纾困帮扶力度，政府提高应急周转资金使用频率和规模。

2023年参加了市政协组织的“优化营商环境，千方百计稳市场主体”专题调研活动，撰写了《关于提振发展信心，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的建议》并作主题发言，建议放宽市场准入，保障民间投资的合法权益，拓展投资领域，引导民间投资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降低融资成本，增强民间投资的融资能力，加大纾困解难力度，助力市场主体渡过难关。

我一直相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工作之余，我跑社区、访企业，围绕经济发展的难点和老百姓的“急难愁盼”认真调研思考。这些年，我提交了20多份提案和联名建议案，只希望能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点子。

2024年两会期间，我撰写的《关于培育文化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建议》受到媒体关注，《湖北日报》记者进行了采访报道，我建议促进相关单位组织开展合作，共享资源，互通信息。通过项目多业态融合的模式提质增效，协同发展。优化创新创意支持政策体系，以奖代补，鼓励进步，完善文化消费项目运营机制，强化运营确保长效。

此外，近年来我还撰写了《关于武汉市第五医院改扩建升级的提案》《关于千方百计稳市场主体的建议》《关于在城市更新中进行绿地碳汇创新建设的建议》等提案被市政协采用，武汉市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了办理和回复。



接受《湖北日报》记者采访

我还担任着省营商环境观察员和市法治化营商环境监督员，多次参与调研和执法检查，为改善我市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鼓与呼。

自担任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委员、企工委主任，省第一基层委员会主委以来，我特别关心社务工作和社员的发展，多次组织社员到成功社员的企业学习、考察、交流，鼓励大家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平时多沟通交流，实现资源共享。我也积极推荐优秀人才加入九三学社，为组织补充新鲜血液。

从扶危济困的涓涓细流，到脱贫攻坚的温暖微光；从抗击疫情的同舟共济，到建言献策的灼灼真言。这条路，我走得坚定而踏实。它连接着社区的烟火冷暖，呼应着时代的脉搏跳动，也映照着我作为一名九三学社社员、一名企业家、一名普通公民的初心与追寻。

公益没有终点，奉献永无止境。站在新的起点，我将继续怀揣这份“九三情怀”，用爱与担当，为城市增添更多暖色，为时代注入更多正能量。

故园放歌：董继宁的艺术人生与咸宁情怀

◇ 柯文翔

2025年深秋，北京王府井王府中心美术馆内，82幅描绘湖北咸宁山水的中国画静静陈列着。幕阜山脉的雄奇、淦水河畔的烟雨、九宫山的云海、向阳湖的文脉，在笔墨间流转成卷。这场名为“故园家山·咸宁放歌”的展览，是湖北省美术院原院长董继宁“江山万里行”系列的第七章，也是一位游子对故土最深情的告白。

从鄂南小山乡走出的董继宁，用五十余载的艺术求索，完成了从“描摹故乡”到“为祖国山河立传”，再到“为故土铸魂”的精神回归，而贯穿始终的，是那份镌刻在笔墨深处的咸宁情怀。

咸宁山水，孕育艺术初心

1955年，董继宁出生于咸宁咸安区汀泗桥镇的一个书香之家，父母均为教师，家

庭文化氛围浓厚，使他自幼受到良好的熏陶。鄂南大地的灵秀山水，成为他艺术启蒙的第一课堂。春日的漫山新绿、夏日的竹海涛声、秋日的沁人桂香、冬日的素白山野，以及淦水河的潺潺流水与古桥斑驳的石痕，深深烙印在他童年的记忆里。

在那个娱乐匮乏的年代，大自然成了他最好的玩伴。他常静坐山间，观察云卷云舒、鸟飞虫鸣，将山水形态与光影变化默记于心。这份对自然的敏感，为他日后的艺术创作埋下最初的种子。

1973年，西河公社铁铺大队“知青”董继宁，因担任展览讲解员而有机会在公社礼堂驻守一个月。寂静的夜晚，礼堂里陈列的画作勾起了他强烈的好奇。那些栩栩如生的画面，究竟是印刷而成还是画笔所绘？这份好奇驱使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偷偷跑到县里买了几支铅笔和一块橡皮，趁着夜

色开始临摹。“怕画不好要擦掉”，这份质朴的小心思，却开启了他相伴一生的艺术之旅。

昏暗的灯光下，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那些线条从生涩到流畅，那些光影从模糊到清晰，让他第一次体验到创作的快乐。从此，绘画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田间地头的休憩时刻、山间行走的间隙，只要有片刻闲暇，他便会拿出纸笔，将眼前的山水、身边的人物定格下来。

咸宁山水不仅赋予了董继宁创作的素材，更锤炼了他坚韧的艺术品格。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曾作为“知青”下放，生活的艰辛并未磨灭他对绘画的热爱。相反，田间的劳作、山野的跋涉，让他更深入地贴近了这片土地。他画牛铃响起的田野，画炊烟袅袅的村落，画乡亲们淳朴的笑脸，这些作品虽带着青涩，却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故土的眷恋。

这段经历让他明白，艺术从来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植根于生活的土壤，正如咸宁的山水滋养万物般，滋养着他的创作灵感。此时的他，虽未接受系统的艺术教育，却已在心中种下了对艺术的执着追求，而这片生他养他的咸宁大地，便是他艺术求索之路的起点。

艺途求索，书写山河壮阔

1975年，是董继宁艺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他迎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作为“工农兵”被推荐上大学。起初，他的第一志愿是湖北省气象学校，但内心对绘画的热爱却始终萦绕不去。彼时的艺术院校招生严苛，他既渴望进入专业院校深造，又担心自己的功底不足。幸运的是，当时的

招生组长看出了他的艺术潜质，结合他的爱好与素养，建议他报考艺术类院校。这个建议，如同一束光，照亮了他前行的道路。

报考湖北艺术学院（现湖北美术学院）的考试并不轻松，既要通过笔试，还要完成绘画创作。董继宁至今记得，他的第一张考试作品是临摹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带着对绘画的赤诚与多年的积累，他顺利通过了考试，于当年9月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踏入校园的那一刻，他仿佛进入了艺术的殿堂，系统的专业教育为他打开了全新的世界。在师范专业的学习中，他广泛涉猎各类艺术基础，素描、色彩、国画、油画等课程都认真钻研，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他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总是比其他同学更加刻苦，图书馆里、画室中，常常能看到他潜心钻研的身影。

1986年至1988年，董继宁参加了湖北美术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课程助教班的学习。这段深造经历，让他对艺术的理解更加深刻。当时的中国艺术界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西方现代艺术思潮与传统艺术观念相互碰撞交融，多元的艺术环境激发了他的创新意识。他师从李宝林、周韶华等艺术大师，不仅学到了精湛的技法，更领悟到了艺术创作的真谛。在学习过程中，他逐渐对色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尝试将西洋画的写生技法与色彩理念融入中国画的创作中，探索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之道。

大学期间的学习，让董继宁完成了从被动创作到主动追求的转变。而在创作方向的选择上，他最终坚定地走向了山水画领域。

“如果我能够把家乡的一种山水，我童年的记忆把它表现出来，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很有意思的。”家乡咸宁的山水记忆，始终是他心中最温暖的牵挂，而山水画，正是他表



《向阳湖上望秋云》

达这份牵挂的最佳载体。他认为，自己或许文学功底有限，但可以用画笔记记录成长、抒发情感，用笔墨勾勒心中的山水情怀。就这样，山水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山水，这份选择，贯穿了他此后的整个艺术生涯。

1977年毕业后，董继宁留校从事行政工作，但他从未放弃过绘画创作。工作之余，他始终坚持写生与创作，不断锤炼自己的艺术语言。随着创作实践的深入，他的艺术风格逐渐形成，将传统山水画的笔墨韵味与时代精神巧妙融合，形成了“笔墨的挥洒写意、构图的诗境营造、色彩的随情渲染”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对创新的探索，充满了对自然生命的感念与对民族精神的颂扬。

董继宁的创作，始终遵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理念。他深知，真正的艺术灵感来源于自然与生活，因此，他常年坚持外

出写生，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从壮美的三峡到雄浑的黄土高原，从秀丽的江南水乡到巍峨的昆仑山脉，每一处山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与画稿。他将自己的身心沉浸于自然

之中，观察山水的肌理、感悟山水的气韵，再将这份感悟融入笔墨之中，创作出一幅幅饱含深情的作品。

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董继宁收获了诸多荣誉与认可。他的作品《长河落日圆》荣获北京国际艺苑首届水墨画5年成就大奖，《史诗中的三峡》参加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并载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悠悠黄土情》入选当代中国山水油画风景展优秀作品，《春醒》获得澳大利亚“93雪梨”亚太地区水墨画大赛亚军金奖。他的作品还被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勤政殿、毛主席纪念堂、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机构收藏，千余件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美术》等报刊。此外，他还先后在北京、广州、武汉、深圳、香港、台湾以及美国等地举办个人画展，让中国山水画的魅力走向世界。

2015年，董继宁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



《一川清风遍鄂南》



《山乡瑞雪兆丰年》

办“江山万里行”主题展览，这是他艺术生涯的一座里程碑。展览分为六个章节，从不同角度展现祖国的大好河山与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以“为祖国河山立传”的宏愿震撼画坛。这场展览，是他多年写生与创作的结晶，也是他对艺术追求的最好诠释。他曾说：“我想在我从事这个专业的时候，能够用手中的这个画笔来展现祖国的大好河山，来歌颂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也是应该去做的一件事。”

赤子归来，乡情润泽故园

艺术成就越高，董继宁对故乡的眷恋便越深沉。事业有成的他，始终不忘生他养他的咸宁大地，怀揣着“寸草之心报三春之晖”的赤子情怀，用实际行动反哺家乡。他最初的想法是在家乡建一所希望小学，但与在家乡工作生活的哥哥交流后，哥哥的建议让他豁然开朗：“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跟你这个专业有关系的艺术馆或者美术馆？”这个建议，与他的初心不谋而合，用自己的专业所长，为家乡的文化发展贡献力量。

2008年8月8日，记山大屋董继宁美术馆奠基，2010年10月26日正式建成开馆，将他报答家乡人民养育之恩的愿望变成了现实。这座美术馆的建设，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从设计、装修到作品陈列，每一个

环节他都亲力亲为。他的初衷简单而纯粹：“我建这个馆，我就想把我们的这种陌生感，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缩小，让孩子们第一手可以接触到，在城市里面看到的，在我们农村照样可以看到。”在他看来，亲身走进展厅观看原作，与看印刷品的感受截然不同，他希望家乡的孩子们能在家门口接触到一流的艺术，激发他们的艺术潜能。

十五年来，这座扎根咸宁山乡的美术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累计举办展览百余场、公益培训千余次，让艺术之花遍开鄂南大地。2025年12月26日，咸宁市美术馆·董继宁美术馆正式揭牌，原场馆正式纳入市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成为咸宁文化建设的重要地标。董继宁在揭牌仪式上动情地说：“收藏研究为办馆之本，展览交流为办馆之策，教育培训为强馆之路，服务人民为建馆之魂。”道出建馆的初心与使命。

除了捐建美术馆，董继宁还以多种方式助力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他将湖北大学聘请他五年的薪酬100万元全额捐赠，设立艺术奖学金，帮助贫寒的优秀学子圆艺术之梦。2025年4月，“湖北大学—董继宁美术馆”研究生工作站正式揭牌，构建起“双导师+双基地”的培养体系，将高校的前沿学术理论与美术馆的实践资源相结合，既提升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又为家乡的艺术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揭牌仪式后，他还亲自为研究

生开展专题讲座，围绕“中国画创作中三个必备能力的掌握与提高”，分享自己的艺术经验与创作心得。

而最能体现他赤子情怀的，莫过于“故园家山·咸宁放歌”系列创作。

从2020年起，已过花甲之年的董继宁，历时五年，踏遍了咸宁的六个县（市、区）。从赤壁古战场的雄浑历史到通山九宫山的云海松涛，从崇阳青山水库的碧波荡漾到通城黄袍山的红色印记，他不仅是在采风写生，更是在进行一次深度的文化寻根与情感溯源。他查阅咸宁的历史文献，走访当地的父老乡亲，深入了解每一处山水背后的风土人情与文化底蕴。“咸宁，为了这个国家的建设，包括我们的院士也有，从革命历史上来讲，有很多的革命烈士，比如钱瑛。这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就要去寻找它背后的文化背景以及它的精神所在。”

2025年11月，“故园家山·咸宁放歌——董继宁中国画作品展”在北京开幕，82幅作品将咸宁的灵山秀水“搬”到了首都，让更多人领略到了鄂南大地的独特魅力。展览现场，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咸宁籍青年感慨道：“看到这些熟悉的山水，仿佛闻到了家乡的桂花香，听到了淦河的流水声，董老师画出了我们湖北人共同的乡愁。”这场展览，是董继宁对故乡的答卷，也是他艺术境界的升华——从宏大的家国叙事，回归到细腻深沉的乡土情怀。

从汀泗桥镇的懵懂少年到享誉画坛的艺术大家，从临摹画作的好奇探索到为祖国



《梦里桃源何处是 一湾淦水秀潜山》

山河立传的宏阔追求，董继宁的艺术人生，始终与故乡咸宁紧密相连。咸宁的山水滋养了他的艺术初心，而他则用笔墨回报了故乡的养育之恩，用行动践行了赤子的责任担当。他的画笔，既描绘过祖国万里河山的壮美，也勾勒过故乡一草一木的深情；他的人生，既书写了艺术求索的执着，也诠释了游子归乡的赤诚。

如今，董继宁依然在艺术与反哺家乡的道路上前行。他计划推出藏品巡展，让艺术真正走进群众生活；他继续关注家乡的艺术教育，助力培育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在他的心中，艺术没有终点，对故乡的眷恋也从未停歇。正如“故园放歌”的主题所彰显的，他用艺术为故乡吟唱的赞歌，将在鄂南大地久久回荡，也将在中国画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柯文翔，《湖北画报》主任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从技术出发，向责任走去

◇ 陈 变

人物名片：陈变，江汉区政协委员，湖北彩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武汉楚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窗外就是科技园区，这里日新月异，创新的脉搏日夜跳动。而在我办公室的一角，政协的会议材料与公司技术蓝图常常叠放在一起。这两重身份，如同我人生的两条主线，交织出我对责任、创新与价值的理解。我想分享的，是一个普通人如何在时代的浪潮中，尝试将个人事业融入公共责任的真实历程。

从“制造者”到“建言者”

我的故事，始于代码与机器之间。2018年，是我创业路上关键的一年。那一年，我和团队成功研发了全国第一套即开票智能

销售系统；紧接着，全国第一台自动售彩机器人也从我们手中诞生。那时候，我满脑子想的都是算法优化、硬件稳定，是如何把产品做得更好、卖得更多，心里装得更多的是效率和效益。

成为政协委员是我思维转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第一次走进政协全会庄严的会场，我听到委员们讨论的，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实际困难，是菜市场里农药残留怎么检测更有效，是刚起步的年轻人创业贷款如何才能真正落地……这些话题具体而细微，直指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冷暖。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的视野似乎被技术参数和市场份额框住了。我开始问自己，能像思考一张彩票如何更快售出那样，去解决那些更广泛、更关乎生活质量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难题吗？

这份自问，促使我完成了第一次角色的

转换，从一个专注于制造产品的企业经营者，开始学着成为一个致力于发现并推动解决问题的公共建言者。我的肩上多了一副担子，眼里也多了一双观察社会的“委员之眼”。这双眼睛，让我无论是拜访客户，还是与同行交流，都会下意识地多问几句：这项技术除了创造利润，还能在哪些社会领域发挥作用？这家企业遇到的难关，是它独有的，还是行业里普遍的现象？我的公司，除了追求效益，还能给周围的社会带来些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

我逐渐意识到，在政协这个平台上，说话有没有分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对实际情况了解得够不够深、够不够透。我相信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扎实的调研，建言献策就成了无源之水。因此对自己提的要求是，每一份提案，都要像一段不能出错误的程序，逻辑清晰，依据扎实。

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把一些商业往来，转化为带着双重目的的调研。和上下游企业以及其他创业者聊天时，我不只谈订单、谈合作，也会把话题引向更深处，了解他们在经营中遇到的政策门槛、招人留人的难处、转型路上的焦虑。

2023年，我决定围绕“如何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快落地”这个主题开展一次系统的调研。前后历时近三个月，我深入走访、访谈了二十多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科技企业，也和自己公司内部技术、管理、销售等不同岗位的同事做了很多交流。

笔记本上记满了实实在在的话：有海归博士说技术找不到地方试验，有老板苦笑着



湖北彩富向江汉区汉兴街捐献抗疫物资

说核心工程师被挖走了，更多的企业呼唤，能不能给个“应用场景”，让新产品先试试水。

这些真实的声音，最终汇聚成了我在2023年区政协重点提案会上的发言核心。我提出，江汉区作为金融底蕴深厚的老城区，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传统商业优势，通过政府的有力协调，推动先进的科学技术尽快落地，形成新的生产力。

我提了两个具体的设想：一是建议区政府牵头组织技术征集活动，筛选出真正有创新性、有市场前景、在赛道内有领先性的技术；二是对于筛选出的民营科技企业，能否给予更有力的奖励和资金支持，并探讨在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背景下，如何与这些企业深化合作，共同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激发经济活力。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些从田野调查中生长出来的建议，因为戳中真正的痛点，在现场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后来我也观察到，区里在制定一些创新扶持政策时，确实更加强调了“科技创新”和“成果落地”的导向。我那份提案，有幸被评为2023年度区政协优秀提案，我个人也被评为了提案工作积极

分子和履职优秀委员。这份认可，对我而言，是鼓励，更是一种鞭策。

这个过程让我深深体会到，政协是一个能把个人的观察和思考，汇聚、发酵成集体智慧的平台。后来我很多调研，都不再是自己一个人闷头干。我喜欢拉上科技界、教育界等其他领域的委员一起，组成跨领域的课题组。大家背景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各异，在一次次讨论甚至争论中，很多最初模糊的想法，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扎实。我自己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也从零散的片段，逐渐形成了更具系统性的思考。

用技术回应时代课题

如果说前面更多是把企业遇到的共性问题，试着转化成政策建议，那后来的一件事，让我和团队真正把技术用到了一个全新的、更重大的领域。

我们做技术的，对社会需求往往有着一种天然的敏感。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巡视巡察这把“利剑”作用越来越重要，但面对现在海量电子数据、复杂的工作流程，光靠传统方法，想快速精准发现问题，就像大海捞针，特别耗费精力。

当时我心里一动：这不正是一个极其典型、需要“智能识别”和“深度分析”的复杂场景吗？我们多年来积累的人工智能技术，是不是可以在这里派上用场，为这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充当一个高效的智能助手？这个想法让我兴奋不已，它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商业考量，更像是一种技术人的本能冲动，用自己最熟悉的工具，去解决一个公认的难题。

2023年，我和武汉楚誉科技的伙伴们下定决心，将核心研发力量全部投入到这个

领域。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攻坚。难点往往不在于技术实现本身，而在于如何让机器去“理解”那些高度专业的政治纪律术语、监督逻辑和风险研判规则。那段时间，我们邀请了纪检监察领域的业务专家全程参与，我和算法工程师团队几乎同吃同住，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封闭式研讨。我们将成千上万的案例、法规条文、工作方法逐一拆解，转化成机器能够学习和识别的模型与规则，再“输入”给我们自主开发并精心调校的“Billows”（巨浪）大模型。

2025年夏天，当那台“纪检监察人工智能巡视巡察一体机”最终通过所有严格测试，稳定地输出第一份结构清晰、指向明确的分析报告时，实验室里先是一片寂静，随后爆发出激动的欢呼声。

我站在后面，脑海浮现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句话。我深知，它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个“全国首创”的称号。它意味着，我们的技术研发终于可以实实在在地服务于一项关乎党和国家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核心事业。这台机器能做的，是帮助巡察干部从繁重的基础信息筛查、比对中解放出来，通过智能关联分析、异常模式识别和知识图谱构建，快速定位疑点、勾勒风险画像，从而让监督者能将更宝贵的人力与智慧，聚焦于最关键的研判、决策环节。这是监督工作从人力密集型向人机协同智能化迈进的一次实质性尝试。

后来，在区里的一次研讨会上，我分享了这段经历。我说，驱动我们完成这个项目的，除了技术上的追求，更是在一次次履职中慢慢明白的道理：一家科技企业，它的创新方向，应该和国家发展需要的方向同频共振。把好技术用到治理的关键处，这大概是我们能交给时代的最实在的答卷。

责任，是落到地上的温度

委员的身份，像一根线，时刻牵着我，提醒我要回到地面，回到人群里。技术可以很高深，但责任和情怀，必须是温暖的、具体的。

我经常参加政协组织的社区活动，有一次去对口帮扶村看望困难党员和高龄老人，给我触动很大。我准备了一些慰问金和生活用品，但更重要的是，我走进他们家里，坐下来，听他们慢慢讲。说说田里的收成，聊聊补助到没到位，有什么烦心事。我常想，企业做得好，离不开社会的土壤。等我们有了些能力，一定要回过头来帮一把那些需要帮助的乡亲，这不仅仅是责任，我觉得这就是本分，是一个企业家、一个基层委员该做的事。

同时，我也在琢磨，怎么让我们开发的科技成果，能惠及更多人，尤其是帮助到社会的薄弱环节。这也是我们公司未来想探索的方向。

在各种会议上，我也常为年轻人说话。我说，留住人才，既要解决房子、孩子上学、看病这些“硬”问题，也要营造一个允许试错、鼓励创新的“软”环境。在自己的公司里，我们大胆设立了“创新试错基金”，让年轻骨干有机会在重要项目里挑大梁。我希望我们这点小小的实践，能给大家制定政策时，提供一个来自一线参考。

回头看看，我从一个只管技术、看市场的创业者，逐渐成长为一个总想兼顾社会责任的实践者；从一个参政议政的新人，慢慢学着成为一个能调研、敢建言的委员。这两条路，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一起，互相补益。



陈彦

做企业让我建言时总想着能不能落地，力戒空谈；而政协委员的经历，则让我跳出了公司的围墙，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和更厚重的责任。正是这种被拓宽的视野，又反过来推动着我的企业，去挑战像智慧监督这样的新课题。

前方的路还很长，新质生产力的浪潮正扑面而来。对我而言，攀登不会停止，我会继续带领我的团队，在技术的深水中探索，争取做出更多服务国家、赋能实业的硬核成果。同时，我也会更加用心地履行一个委员的职责，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这些大事，更扎实地调研，更精准地发声，当好那座连接各方、凝聚共识的桥。

一个海归青年的十年乡村路

◇ 尹雨龙

人物名片：尹雨龙，江夏区政协委员，湖北未来家园高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有人问我，放着国外优渥的生活和光鲜的金融工作不要，为什么要回到家乡武汉江夏的农村，当一个面朝黄土的“新农人”？答案很简单：因为我生在梁子湖畔，长在武汉这片土地，根在这里，情也在这里。乡村振兴的时代召唤，更让我想把学到的东西带回家乡，实实在在做点事，走出一条属于咱们湖北的乡村振兴路。

此心安处是吾乡

2010年我远赴美国求学，学的财务，后来还考取了美国注册会计师。但在国外待得越久，心里就越惦记家乡的那片山水。父亲深耕农业多年，始终坚信农业是有奔头的，正是这份坚守，让我渐渐认识到，现代农业早已不是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是一条科技赋能、产业融合的新赛道。

2016年，我第一次来到江夏区舒安街

田铺村，那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村里土地荒了近10年，杂草丛生，全村转了一圈，只见到了5位老人。这是典型的空心村，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村里没产业，没人气，更没什么盼头。那天我站在地头上，心里就一个念头，把这片地重新弄起来，让村里的人在家门口也能过上好日子。

这条路并不好走，要在一片荒地上打造集科技农业、农产品深加工、文旅康养于一体的三产融合园区，面临着诸多困难。很多人觉得我一个海归硕士跑来做这个，是瞎折腾。可我自己清楚，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有了产业乡村就有未来。我坚定地走三产融合的路子，以农业种植为基础，一产种地、二产加工、三产做服务和旅游，让一亩田产出三倍的效益，让土地活起来，让乡亲们富起来。

农业是三产融合的根基，我始终把科技兴农放在首位。园区刚落地时，我们面临着品种单一、种植粗放、效益低下的问题。我带着团队跑遍全国科研院所，联合农科院、华中农业大学等10余家单位，投入大量资金搞研发。

慢慢地，我们形成了“一果一花一草”的特色种植格局：在3900亩猕猴桃基地里，利用猕猴桃网架透光60%的特性，在林下套种栀子花，一地双收，生态又高效；蛹虫草的人工培育，我们攻关了3年，现在从接种到采收全都实现了产业化，建成了国内最大的智能化培育馆；还建立了立体水培蔬菜馆，利用物联网精准控温控湿，种出来的菜无农药，价格翻了好几倍。

在我看来，现在种地早就不是靠老经验埋头干了，得靠智慧、靠科技。我们把物联网技术用在了园区里，把所有管控都做成数据化、可视化，还建了园区的智慧实验室，让种植、加工、流通，还有园区的管理都实现智慧化，用科技给农业提效赋能。

这些年带着企业一步步干，也拿了不少荣誉：武汉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还有国家级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我个人也获评“江夏区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进个人”。这些对我来说，是荣誉，更是责任。我一直都觉得，培养更多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是我们这些做智慧农业的青年该扛起来的活儿。

三产融合让土地“活”起来

农产品种出来了，怎么才能卖出好价钱？这是我琢磨的第二个问题，而第二产业的深加工，正是把产业链打通的关键。我们依托种植基地，建起现代化农产品加工车间，把田间的产品变成市场青睐的高附加值商品。蛹虫草制成虫草粉、虫草茶、虫草酒等深加工产品，身价翻倍；栀子花提取生物精油，研发成面膜、护肤品，变成时尚的消费品；猕猴桃酿成果酒、制成果干，保鲜期长了，销路也宽了。从一颗果子到一瓶饮

品，从一株虫草到一盒护肤品，我们把农业的“一根线”，织成了产业的“一张网”，让农产品从田间到工厂，从原料到商品，彻底变了样。

如果说一产是根基、二产是支撑，那么三产文旅康养就是让乡村聚人气、添活力的关键。乡村不仅要产粮食、产产品，更要产风景、产快乐、产健康。我们依托着梁子湖的自然风光，在万亩园区里打造了银杏大道、滨湖花海、水上乐园等文旅项目，配套餐饮、住宿、会务服务，把农业园区变成旅游景区，把田园风光变成消费场景。同时，还打造了乡村振兴红色党建馆、武汉数字化老年大学，与60多所高校合作搞研学，让城里人走进乡村、爱上乡村、留在乡村，让人流、物流、资金流都活起来。

三产融合的好处，就在于一产给二产供原料，二产提升价值，三产带来人流，人流又反哺一产二产，形成良性循环。现在的未来家园，早不是单一的种植基地了，而是集生态种植、健康加工、文旅康养、科普研学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年营收突破了2000万元，成了武汉三产融合的示范园区。

园区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也从没忘记自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没忘记乡村振兴的初心，就想带着老家的乡亲们一起富起来。10年来，我们通过土地流转，为田铺村及周边村湾增加集体收入1600余万元，每年拿出30多万元为村民购买养老保险、帮扶困难群众。同时还累计创造1600余个长期和季节性就业岗位，100余个固定岗位，让近200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其中包括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30多户低收入家庭。

田铺村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青年开始返乡就业，曾经的空心村，如今炊烟袅袅、人气满满，村里修了新路、设了快递点，生

活比城里还惬意。村民沈秋节原本在外打工，收入低还顾不上家，如今在蛹虫草培育馆当技术工人，穿着无尘服操作设备，每月有稳定收入。夫妻俩都在园区上班，既能照顾老人孩子，还翻新了房子、买了车，日子越过越好。

我们还积极参与建设新型农民教育培训中心，每年免费给乡亲们做培训，累计在农业技术推广等方面培训 2000 多人次。我本身就是农村出来的，对农业、对农民打心底里有感情，也真心觉得，农业这片天地，年轻人干下去肯定能有一番作为。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2019 年，江夏区成立了全省首个党员乡贤企业家联盟，我们积极参与，通过组织引领、产业引导、人才引路，吸引更多党员、乡贤、企业家回到乡村，成为乡村振兴的骨干力量。我们还承办退役军人定向招聘会，搭建就业创业平台，让退役军人能在乡村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

我想做的，不仅是自己返乡创业，更是搭建一个平台，让更多海归青年、新农人、能人志士扎根乡村，让人才成为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

共富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作为江夏区政协委员，我积极参加各种会议、调研、考察，到村里、企业里了解情况，把大家的需求反映上去，实实在在建言献策。在江夏区政协六届二次全会上，针对农业企业用地难的问题，我提交了《关于农业产业融合园用地政策研究和试点的提案》等建议，后来推动了省内第一家农业点状供地试点落在舒安街，解决了用地难题。我还跑遍了舒安、湖泗的企业和村湾，调研基础



尹雨龙在介绍产品

设施，提出了《关于对舒安电力增容及改善电力基础设施》建议，后来 35 千伏舒安变电站增容工程顺利完工，解决了村南部农业用电的问题。

在舒安街联络委的协商会上，我针对交通问题提了建议，推动了 J203 等线路升级开通，让乡亲们出行不再难，困扰村湾留守老人多年的出行问题也得到解决。还有美丽乡村湾建设、环境整治、污水处理这些事，我也尽力去推动，希望老家环境越来越好。

十年耕耘，十年坚守，从荒地到万亩园区，从空心村到幸福村，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未来家园的故事，就是我一个海归青年回报家乡的答卷。有人问我，这十年苦不苦？说实话，苦过、累过、迷茫过，但每次看到乡亲们的笑脸，看到这片土地的变化，看到乡村振兴的希望，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作为一名海归青年、一名江夏区政协委员，我清楚自己肩上的责任。新时代的乡村振兴，给了我们年轻人施展拳脚的舞台，也给了我们回报家乡的使命。未来，我会继续走三产融合的路，深耕科技农业，做强深加工，做优文旅康养，带动更多乡亲走上共富路，让梁子湖畔的田园更美，让湖北的乡村更旺，让海归青年的桑梓情，在乡村振兴的热土上绽放最美的光彩。

造价人的城市脉搏与时代缩影

◇ 吴宇宏

人物名片：吴宇宏，辽宁省朝阳市人，湖北畅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国际测量师，湖北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协会专家库专家、武汉市造价咨询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

在工程造价这个以数字为核心的领域，有人追求速度，有人追求成就。而我，坚持用严谨与细致丈量每一个项目，在我眼里数字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承载着城市的动脉与建设温度。

从初入职场的小白到项目经理，再到如今的造价公司负责人，从单一项目到全过程咨询，一路走来，我见证了中国工程造价行业的深刻变革，我的经历，是专业与情怀的交织，更是时代发展的真实写照。

“赶上了好时代”

1995年，武汉长江二桥通车，一座城市的脉搏在江涛中加速跃动。那年秋天，我背着行囊，坐了两天的绿皮火车，从东北来到这座江边的城市求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后合并更名为武汉大学测绘学院）的校园里，梧桐叶正黄，我的大学生活，也从这里开始。

我的大学四年如果用一个形容词概括，就是“平淡”。图书馆里的潜心研读，课堂上的思想碰撞，实习工地上的汗水挥洒……按部就班做着学生该做的事。如今同学里一大半叫我“大哥”，因为上学时我留着跟现在一样的短发，东北人的直爽与大大咧咧在我身上尤为明显，军训时带头喊指令口



藏龙岛新区科研综合大楼项目

号……他们都笑我是“假小子”。这份直爽，倒像一根没磨钝的铅笔，陪着我扎进了往后的三十年。

1999年本科毕业，回老家不甘心，出都出来了，何不在这个城市打拼一把，便入职中国对外建筑总公司武汉分公司。

1999年的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方兴未艾，建楼、修路、架桥如火如荼，我就读的城镇建设专业，无疑是对时代脉搏的一次精准把握。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是武昌火车站对面的安华酒店装修，造价7000万，体量算是比较大的，也是这个项目，让我在装饰装修造价领域打下了坚实基础。

老工程师都很喜欢我，造价、施工、设计各个环节我都跟着跑，牵个尺子拎个东西，跟着老师傅们一步步学。工地上各个角落怎么做的，规格尺寸我都记得，酒店像迷宫一样，我每天在里面自由的穿梭。

1999年至2006年我在施工单位工作，有幸参与多个大型项目，可以说是赶上了好时代，构建起我对建设项目全流程的系统认知。2002年我独自完成了安华酒店的结算，也认识了几位造价行业的前辈，对我影响很深，公司的同事老王就是那时候认识的，一直互相学习，互相助力至今。

“两点一线”勾勒出我日复一日的奋斗轨迹：白天，在尘土飞扬的项目现场，用尺

子仔细丈量梁柱板墙每个建筑元素的规格型号；夜晚，在寂静的书房里，笔尖在图纸上沙沙作响，计算器按键声此起彼伏，计算着每个子目的工程量。有些设计图纸不详细，没能直观的

展现对应的规格尺寸，为核准一个工程量，我常常对着图纸反复推算。最早没有电脑辅助，一台计算器、一支笔、一把尺，便是我的全部装备。

那时有本《建筑工程湖北省统一基价表补充预算定额（试行）》，我对书中内容熟稔于心，甚至能精准说出每个子目所在的章节页码。我记忆力很好，一个电话号码拨两次就能都记住，做过的项目，即便时隔许久，别人问及造价金额，我也能准确作答。对数字的天然敏感性冥冥之中为我的造价之路埋下了伏笔。

“成为有证的人”

毕业第二年，我在武汉的出租屋里完成了人生大事——结婚。为了更好地生活，我会接私活干，认识的人多了私活也多起来。面对客户紧迫的工期要求，我日夜奋战，确保造价核算准确无误，保障项目顺利推进，经常熬通宵。那时身上有用不完的劲，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干好。赚了钱一半潇洒一半储蓄，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造价人的笔尖，悬着的是工程成本。造价工作要细心，容不得半点马虎，哪怕是小数点点错位，都会给工程造价带来很大的变化。“每个数字，都要有出处，不能拍脑袋

乱写。”这是师傅们常挂在嘴边的话，提醒我每一个项目都要尽全力达到最大的准确率。正是这份敬畏之心，使我顺利主理了多个项目，逐渐在行业站稳脚跟，树立了良好口碑。我的私活也越来越多，收入远远超过当时的工资。

我休闲的方式就是打网游，彼时最火的网游“传奇世界”，是我劳累后最好的放松方式之一，但有一次抱着丫头玩网游，四岁的她突然挥舞着小手喊“妈妈，快喝红喝红”，游戏里有生命值和魔法值，红色小罐子代表生命值。听到孩子这么喊，心想完了，带出来一个小游戏迷，于是果断戒断游戏，把价值几千的游戏号送人，我要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学习去。

既然往造价这条路上走，就要做精做专，得提升自己。我国于1996年首次实施一级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填补了当时工程造价领域的职业资格空白。1998年起由人事部、建设部共同实施全国统一考试，造价师证也成为了行业深耕的重要“敲门砖”。

2005年我决定考造价师证，那会儿通过率很低，我关了手机，把自己埋进书堆里，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有幸通过，成为了有证的造价人。当时有一个互为鼓励的考证QQ群，群里结识了“网友”老严，在隔着

屏幕聊了一年多才见上面，日后竟神奇成为并肩创业的战友。

“自己当老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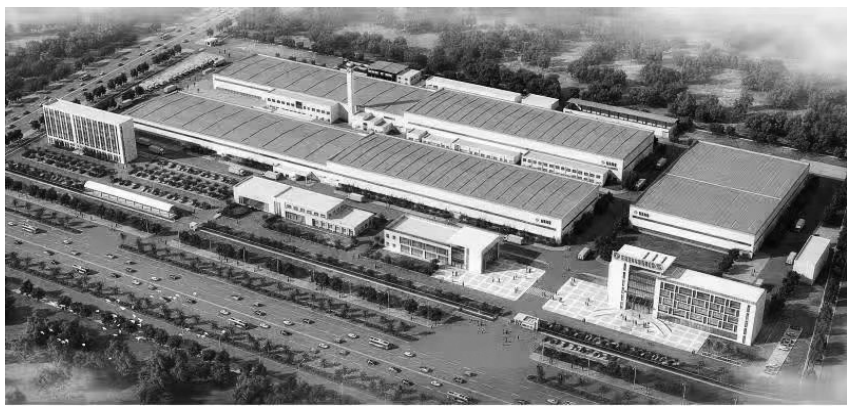
拿到造价师证后，就有公司来主动联系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离开工作7年的施工单位入职一家造价公司。2007年至2010年，任职项目经理，在几所高校负责校园建设的审计工作。

工作期间，总结出了现场跟踪审计的重难点，整理出现场跟踪审计的注意事项，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了建设成本。我用自己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及扎实的专业知识，赢得了多位负责人的赏识。在我看来做审计的审的不仅是数字，更是责任。这份责任，或许就是我行走在整个行业的底气。

2010年，我和老严接手湖北畅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和）。这家公司成立于2006年，注册完后无专人经营，无技术无团队，处于闲置状态。而我们手里刚好有项目，需要一个平台。别人是先建立公司然后找活，我们是原本手头就有活，心里更有底气，无非需要操的心多些，风险也大些，但值得一试。

恰逢东风汽车很多的厂房从十堰市区往郊区搬，畅和便承接了他们的部分业务。我们白天跑现场，晚上整理资料，计算数据，累了就趴在办公桌上眯会。公司就这样，从两个人，到五六个人，再到十几个人，慢慢立住了脚。

回忆那段岁月，我觉得是时代造就了个人。那



东风汽车随州车轮厂项目



武汉东湖保税区项目

时，国内基建迎来发展快车道，造价咨询项目遍地开花，可专业人才比较稀缺，我们也算较早投身这行，赶上了好时期。

“进入军工领域”

2013年畅和开始进入军工领域，后因管理更规范，要求更严格，我们在2018年申请“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条件备案证书”。这个证书从申请到通过，整个过程至今历历在目。

我们请了一个代理公司指导整理资料，代理人再三告知要十分努力，这个证书的通过率只有35%左右。评审组有一位要求非常严格的评审组长，如果遇到他那更是难上加难。人生有时候就是怕啥来啥，我真的就抽到了那位组长。

按流程，在天河机场接上他后，我试图和他搭话增加好感，在接待细节上做到极致。一路上我小心翼翼找话说，他硬是一点回应没有，内心那时候非常纠结，也很委屈，不知是退还是进。冷静一下，想着我那么多员工

看着呢，大家准备了这么久，不能退！

于是我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沟通，讲我的求学、创业历程，讲我一个东北来的女子举目无亲在汉艰难打拼的历程。直到车子开到二桥上，老人家终于开口，说小丫头，你说完了吗，我是太累了，累到不想说话。这一刻我释然了。抵达酒店我小心询问可不可以给我10分钟

介绍一下公司，他犹疑片刻答应了，一聊就是1个多小时。

聊完后我心里有底了，只要给我开口的机会，只要能了解我们公司，我就有信心申请到备案。不出所料，第二天的评审高效顺利，如愿拿到备案，后来我和老人家还成了忘年交。如今军工领域的业务仍然在延续，成为公司核心业务板块之一。

“拥抱变化”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建筑行业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构。传统房建业务逐步收缩，城市更新、新能源、绿色建筑、EPC



永桐公路项目

工程总承包等领域成为行业新的增长极。2021年，国家出台资质改革案相关政策，逐步推广全过程咨询，数字化强制推进，行业也慢慢从过去的资质驱动，转向专业能力与服务能力驱动的新发展模式。

AI技术的普及，更是给行业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目前大部分造价企业的AI技术使用率已达40%左右，大大缩短了算量周期，有效降低了核算误差率；BIM技术与大数据分析也逐渐成为造价工作的标

配，全过程动态成本管控成为行业主流；与此同时，基础工作岗位的需求正在下降，建模、算量、清单编制等传统岗位逐渐被智能化工具替代，而审核、商务谈判、全过程工程管理等复合型岗位则愈发吃香。

行业在变，我们的经营理念与发展思路也必须紧跟改革步伐及时调整。盈利模式上，从过去按造价比例收费，逐步转变为绩效付费、成果挂钩的新模式，以专业服务成果赢得市场认可。

新冠肺炎疫情后，经济形势承压，再加上造价咨询资质的取消，行业内卷愈发严重，过去的标准收费文件几乎失去了参考意义，为承接业务，市场上的低价竞争愈演愈烈。记得造价咨询协会曾经组织过一个自律小组，号召大家坚守行业底线、杜绝恶性竞争。前一天大家还一起签下自律书，可第二天东湖高新区的一个项目招标，便出现了几乎零费用服务的报价，行业内卷的程度可见一斑。

如今，面对AI浪潮的冲击与行业恶性竞争的双重压力，焦虑成为了造价行业从业者的普遍心态，我也不例外。行业内不少企业开始调整人员结构，降薪、裁员的消息屡



在武汉市女企业家活动上发言

见不鲜。截至目前，畅和仍在努力坚持，既没有裁员，也没有给员工降薪，但我深知，这并非长久之计。

唯有拥抱变化方有出路，我鼓励员工积极考取各类职业资格证书，组织开展BIM技术、AI造价工具、全过程工程咨询等专业技能培训，推动团队从传统的算量员，逐步向懂技术、会管理、能决策的项目经济决策型人才转型。

我坚信，AI技术终究只是提升工作效率的工具，它能替代重复、机械的基础工作，却永远替代不了人的核心判断与专业思考。每个工程项目都有其独特的背景与需求，每个客户都有其实际的难处与诉求，这些背后的人情与考量，需要造价人用专业积淀去感知、用行业经验去研判，这才是造价人无可替代的核心价值。

父亲张良皋：建设武汉显身手

◇ 张 眺（口述） 雷敏功（整理）

我父亲参与建设武汉，要从1949年8月说起。当时，父亲是汉阳新民中学的教师，被派往襄南公学参加教师训练班。就在这时，武汉市建设局第一任局长鲍鼎先生派人来找我父亲。当时要建汉口电工器材厂，这是一家军工企业，急需建筑设计人才。我父亲早年在上海范文照建筑师事务所工作过，那是国内最顶尖的建筑设计所，由此积累了丰富的建筑设计经验。

鲍鼎先生是我父亲在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求学时期的系主任，在业界素有“北梁南鲍”之誉，他一向欣赏我父亲并长期给予资助。面对恩师的相邀，父亲没有丝毫犹豫，当即从襄南公学退学来到汉口。汉口电工器材厂在汉口胜利街，工程于1951年完工，设计与建造质量都得到上级高度认可，甚至准备调他入京到国家邮电部工作。出发前，父亲特意向鲍鼎先生辞行，也想当面征求他的意见。

鲍鼎先生当然希望我父亲留在武汉，一

番挽留之下，父亲最终进入刚组建的武汉建筑工程公司设计科（1954年发展为武汉市建筑设计院），从此扎根武汉，开启了数十年的建筑设计生涯。

武钢红房子：七十年前的宜居设计

1953年，父亲主持设计武昌纺织工人住宅区。从积玉桥往青山方向，沿江一带有成片的大型纺织厂，相应的职工住宅区也很大。这在当时是一项颇具规模的大工程，必须同步统筹住宅区与周边道路，也为后来武昌和平大道的建设奠定基础——这一整套系统的规划布局，都是由父亲主持的。

在设计住宅的同时，父亲一直在研究：武汉夏季气候闷热潮湿，如何因地制宜建设生活区？他结合武汉地处北半球的特点，在日照、季风、绿化、建筑朝向等方面，提出了系统的“群体荫蔽”理念。纺织工人住宅区的房子，并非简单的正东西向或正南北

向，而是做了适度倾斜，既满足建筑规范里的日照时长，又通过楼栋之间的布局形成自然遮荫，最大化利用自然条件，改善居住环境。他设计的遮阳板，倾斜角度、挑出尺寸都是经过精细计算，使采光和遮荫效果达到最优。

纺织工人住宅区还未收尾，父亲又接受了更重大的任务。1954年，武汉钢铁公司建设上马，父亲担任武钢职工住宅区的设计总负责人，包括住宅、学校、商店、医院、餐馆等配套设施。

武钢职工住宅区的预算，最初是每平方米80元。国家资金紧张，钢铁工业必须上马，数万职工必须安居，如何用最少的钱安置最多的职工？父亲反复优化，造价一降再降，从80元降到50元，后来上级又要求进一步降低。

父亲大胆创新，非承重部位不用钢筋而改用竹筋。武汉气候潮湿，竹子耐潮适宜使用，且就地取材，价格远比钢筋便宜。最终，造价降到24元，住宅却质量优良，历经数十年风雨。2015年我去观看时，部分墙面表皮脱落，还能清晰看到里面的竹筋结构，《长江日报》也曾报道这一罕见做法。对比后来的一些“豆腐渣工程”，更能显出父亲那一代建筑师的公心与匠心。

红钢城从高空俯瞰，街坊格局规整有序呈“囍”字结构，外部带有中国庭院的符号特征，内核却是以人为本的实用与舒适。房屋内部通风极佳，公共活动空间通透凉爽，是真正的宜居设计。当年的住户子女，如今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提起居住环境仍交口称赞。

2014年9月2日，武汉电视台在八街



红钢城八街坊红房子

坊一座亭子中采访父亲，父亲特别强调说：“这个八街坊必须保护，我应日本东京大学之邀，向他们介绍的就是武钢生活区。”现场许多居民围上来说：“咱们这房子太好了，不能拆啊！”

2015年父亲去世后，我专门去红钢城，看到红房子依旧坚固。2023年夏天，我和先生、侄儿张点（武汉大学建筑系教师，可谓孙承祖业）再去探访，八街坊列为武汉市二级优秀历史建筑，有关部门考虑“修旧如旧”，形成历史文化风貌街区保护下来。

1975年，父亲接手了另一项大型生活区工程——湖北化肥厂住宅区，地点在枝江。湖北化肥厂的建设，后来推动枝江从县升格为市。2024年8月，我和先生、张点专程前往，生活区格局依旧，规划放到今天也不显落伍：幼儿园、小学、中学、食堂、医院一应俱全，稍远处临湖还有外宾招待所。我们到访招待所时，负责人十分自豪地说：“这是大师设计的。”当我们表明身份，这位负责人格外热情，与张点深入交流许久。

汉钢转炉车间：特大型工业厂房标杆

1950年代，国家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父亲担纲设计了不少工业建筑，如1958年



汉阳钢厂转炉车间

建立的武汉国棉二厂，厂区与生活区一并规划，生活区又纳入武昌纺织工人住宅区的整体片区之中，在当年名气很大。

父亲设计的工业项目中，最值得骄傲的是1967年设计的汉阳钢厂转炉车间，这在当时是全国重点工程，也是国内跨度最大的工业建筑，由父亲这样的资深建筑师担纲重任。

转炉车间的设计，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集中在地形、结构、工艺三个方面，也正是在破解这些难题的过程里，父亲的建筑智慧得以充分展现出来。

转炉车间的选址，是一片整体倾斜的坡地，通常办法是大规模挖方平整，甚至拆掉周边的房屋。这样不仅成本高，还会破坏历史肌理和老街区。我父亲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他提出：不拆一屋，不硬整平，让建筑顺着坡地自然布局，内部用分层标高来处理，外表方方正正，根本看不出它建在斜坡上。这样既省了投资，又保护了场地原貌，

体现出超前的生态与历史保护意识。

为了满足炼钢的完整流程，父亲将车间设计成三跨连续厂房：冶炼、铸锭、精整。冶炼跨高达几十米，直接接高炉铁水；铸锭跨最宽，负责钢水浇铸；精整跨做后续处理。三跨高低错落、功能清晰、衔接顺畅，流水作业科学高效。在结构上，用大跨度钢屋架加钢筋混凝土柱子，充分考虑高温、震动、腐蚀的极端环境，兼顾强度、抗震和耐用性，其跨度和高度达到国内最大，堪称特大型工业厂房标杆，代表了那个年代中国工业建筑的最高水平。

1970年转炉车间建成投产，它是汉阳钢厂的核心产能车间，为国家建设源源不断输送钢材，成为新时代“汉阳造”的象征之一。如今，转炉车间已列为文保单位，其间还有一段趣事：为保护这座建筑，汉阳区政协开会时，有政协委员提出：“要是能请动张良皋先生出面，这事就成了。”张之洞博物馆馆长顾必阶——我爷爷弟弟的女婿正好在场，他不动声色地问：“为何非要请张先生？”这位答道：“张教授敢说真话、善说真话，有他出面，转炉车间留存的胜算定会大增。”顾必阶随即应允“那我去试试”。他找到父亲说明来意，父亲听闻自己的作品能被重视并作为文物保留，欣然应允全力支持。他直言：“偌大的中国，不能只念叨张之洞那个年代的遗产，新中国建设这么多年，也该留下些时代印记。”

如今，转炉车间已列为武汉市文保单位，未来保护级别还有可能提升。武汉的工业遗产，不能只有晚清民国的遗存，新中国建设时期的代表作，同样值得永久留存。更有趣的是，转炉车间的上料系统部分，是我哥哥设计的，父子联手留下一座国家级工业遗产，也属佳话。

人民广场：七天满足《东方红》演出

1953年，父亲设计了武汉市解放后第一座专业电影院新华电影院，外观运用中国传统建筑语言如夔龙纹、万字纹等元素，内部则在声、光、电方面精益求精。他把声学、视线、通风、采光全部考虑到极致：观众席坡度每一排都不挡视线，厅内声场均匀清晰不闷不噪，通道宽阔出入口合理，既保障疏散安全，又显得开阔大气。

多年后父亲再去电影院，工作人员自豪地告诉他：“张老，我们这影院，不管坐在哪个角落，电影的画面和声音效果都是一流的！”老武汉人也说：“到新华电影院看电影最舒服，坐多久都不累。”可以说，新华电影院成为几代武汉人的集体记忆。

中山公园人民广场的舞台设计，也出自父亲之手。1965年，市委决定在人民广场演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个只能放映露天电影的场所，需要大幅改造升级，才能满足阵容庞大的演出要求。父亲仅用七天时间完成方案设计，保证了《东方红》的顺利演出。

1974年，人民剧院需要改建，这是个难度大、麻烦多的项目，属于没人愿意接手的“癞痢头工程”，最后落到父亲身上。他投入大量心血精心设计，改建非常成功，使用效果广受好评。他曾自嘲：“恰像卓别林在《淘金记》中啃皮靴，那鞋底被我咀嚼得有滋有味，到后来甚至令人艳羡。”

我哥哥张甘（退休前为华中科技大学《新建筑》编辑）曾给整理者讲过一段趣闻：人民剧院改建后的首次彩排演出，迎来两位特殊的美国观众——美国时任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布什（后来的美国总统乔治·赫

伯特·沃克·布什）和夫人芭芭拉。因为布什夫妇曾提出想看武汉杂技团的演出，有关部门便邀请他们前来观赏，父亲作为设计师也应邀出席。在贵宾席就座，父亲起身打量剧场的整体效果，与布什先生的目光相遇，主动上前用英语致意，布什礼貌起身回应。身旁的女翻译询问父亲的身份，父亲笑着答道：“我是这座剧院的改建设计师。”女翻译询问是否需要协助翻译，父亲摆摆手：“不必了，我们聊的内容，恐怕你会听不懂。”父亲对布什说：“听闻您二战时是海军航空兵，九死一生。我也曾是二战老兵，在美军援华昆明炮兵训练所担任译员。”布什打趣道：“那我当年可没轰炸过你。”父亲笑答：“我也没朝你开过炮。”布什夫人芭芭拉在一旁掩嘴微笑。事后，女翻译好奇地追问对话内容，因为许多名词她完全听不懂。父亲解释：“这不怪你。我们聊的都是二战期间英美军衔的专业术语，好多连美国人英国人都听不大懂。”

1982年，父亲回到汉阳县为家乡贡献力量，既做设计也培养当地人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设计侏儒镇文化宫（文化馆）。建筑依山而建，巧妙利用山势，体量不大却构思精巧，山石造景虚实结合，先后荣获武汉市、湖北省乃至全国奖项，是家乡人民的骄傲。父亲还应邀为文化宫题写楹联：“浩荡聚膏腴，汉沔昔分云梦泽；葱茏增气象，侏儒今胜泰华山。”

苏军烈士墓：从方案到落地优化设计

解放公园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是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外籍抗战烈士纪念设施。1955年，武汉市民政局启动烈士墓迁建工程，将原安葬于汉口万国公墓的烈士遗骸迁



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纪念碑

葬至解放公园。武汉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黄康宇先生担任总体设计，我父亲负责施工设计与现场落地执行，深度参与建造——将蓝图转化为详实的施工图纸，这是考验建筑师功力“从方案到落地”的全过程。父亲凭借扎实的功底，圆满完成了此项任务。

当时国家资金、物资紧张，项目初期预算仅5万元，后来虽追加至14万元，仍面临材料紧缺、施工条件简陋等难题。父亲怀着对国际主义英烈的崇敬之心，结合原有地形地貌展开设计优化，充分利用公园河道开挖的土方垫高纪念广场，依托朝梅岭、夕桂山的自然高差，构建起层次分明、庄严肃穆的纪念轴线，实现了地形利用与纪念氛围的高度统一。

在材料选用上，父亲秉持节约务实的原则，主要采用白矾石、花岗石等本地建材，部分石料取自万国公墓的建筑遗存，在有限条件下保障了纪念建筑的坚固与庄重。受限于经费与施工条件，原方案中的穹顶纪念坛未能实施，最终确定以方锥体纪念碑为核心

的设计形式。纪念碑通高8米，碑身挺拔简洁，碑头直指苍穹，碑座镌刻中苏两国国徽。墓台长32米、高3米，以淡青花岗石砌筑，正面镶嵌烈士姓名，周边配植龙柏、雪松等常绿乔木，烘托肃穆缅怀的氛围。

父亲很少主动提起这些往事，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烈士墓的施工图出自他手。有一年，我带学生去扫墓，同学们不识繁体字，我站在碑前讲解，踩上铺有白矾石的台基。父亲知道后温和地告诉我：“白矾石要保持洁白，不能随意踩踏的。”他们那一代人对先烈、对建筑的敬畏，是刻在骨子里的。2013年，长江日报社邀请父亲重回墓地，他看到有人在墓地跳舞、打球，叹息烈士安息之地不该如此。

1976年，父亲为解放公园设计转马棚，项目荣获设计奖。这个设计对立体几何要求极高，他大胆使用新材料玻璃钢，重量轻，造价低，公园与玻璃钢厂都十分满意，为新材料找到了应用典范。

在解放公园，父亲还设计过二号门、露天剧场大门、电影院。公园知道他的文学素养，请他为园内八景题名：“八骏印蹄”“万杉流影”“长廊丽色”“曲榭清音”“梅山朝雪”“桂岭晚风”“栈桥步月”“笔塔贯虹”，雅致隽永，后被收入《品读解放公园》一书。

父亲还以亲情与友情，参与中山公园的改扩建工程设计。我的一位堂舅在公园负责基建，时常邀请父亲帮忙，父亲二话不说，有求必应。中山公园内的水禽岛、猴房、观鱼港、大湖孤岛、涌雪矶等，都是父亲的义务设计。公园领导要酬谢，父亲只向公园要了三株梧桐树苗，栽在我们花桥宿舍的院子里。有年春节，我们还收到公园送来的一盆深红色菊花，那是我们家少有的鲜花，所以记忆格外深刻。

洪山无影塔：整体迁移完美复建

1960年代初，父亲接到一项重要任务——迁移洪山无影塔。

当时国家正大力搞建设，不少老建筑都要为发展让路。1961年，中南民族学院扩建，一座南宋时期的无影塔正好在规划范围内。无影塔是武汉现存最早的石塔，雕刻精美，夏至正午没有影子，有极大的历史与文物价值。

一开始，有人提议把无影塔迁到洪山宝塔脚下。父亲实地查看后坚决反对。他认为，洪山宝塔雄伟庄重，无影塔小巧精致，建造年代、风格、用途完全不同，放在一起既不合古制，也破坏了两处古迹的韵味。他查阅古籍、反复绘图，提出把无影塔迁至施洋烈士墓西侧，让洪山宝塔、无影塔一东一西相互呼应，既保护了文物，又和革命纪念地融为一体。经过多次讨论，这个方案最终被采纳。

迁移的难度更大。之前迁古塔曾因方法不当损坏不少古砖。父亲借鉴文物编号保护的办法，从塔顶开始，每拆一层就仔细测绘，



洪山无影塔

为每块砖石编号，确保复建时一丝不差。当时物资条件差，没有防水颜料，他就用松烟、桐油、朱砂自己配制；仪器精度不够，他专门借来经纬仪校准。拆塔基时，底层青砖已酥软，他蹲在工地细心排查，请工人用托换加固的方法稳妥修复。1963年冬，无影塔原样复建完成，一块砖石都没有错乱。

如今，我们在洪山公园看到的无影塔、施洋烈士墓、洪山宝塔相互映衬的景象，正是父亲当年用心守护的结果。

归元寺素菜馆：武汉为建筑师首次立碑

1980年代初，归元禅寺已是武汉重要的外事接待窗口，曾接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等重要外宾，但长期缺乏配套的起坐、进餐场所，接待条件简陋。1983年，政府拨款3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新建一座符合寺庙风貌的素斋建筑，这便是后来的云集斋。

此时父亲已退休，受聘于武汉市二轻工业局设计室，因其深耕中国古典建筑与巴楚建筑文化，被推荐为该项目的主设计师。

父亲坚持新建筑必须与归元寺原有殿宇风格统一，采用中国古典式建筑形制，但拒绝生硬模仿，主张“活学活用”，使之既保有禅林的庄重，又能满足现代接待功能。建成后，归元寺报以善果，特意在云集斋一角为我父亲立碑，这是解放以来武汉为建筑师立碑留名的第一块。

归元寺能有今天的完整格局，父亲功不可没。1954年，为建设汉阳枕木厂运输木材，有一条铁路专线计划拆除归元寺部分建筑。父亲在审议会上坚决反对：“绝对不能拆，这是影响重大的文化遗产与民族宗教场所。”他的意见被领导采纳，归元寺得以完整保存。随后西藏代表团到访武汉，归元寺



归元寺云集斋及立碑

成为重要文化展示窗口。此外，归元寺的三塔院，也是父亲的设计。

父亲建筑规划设计领域宽阔，包括华中农学院、武汉工学院等教育建筑。此外，他的足迹还走出江城远到省外，主持过庐山风景区的总体规划，承担过江西省风景区规划和旅游的咨询工作。

在省内，父亲受蕲春县邀请，1987年主持设计李时珍医院。项目用地是一片15亩的藕塘，他对中国传统建筑研究精深，设计将水塘与建筑融为一体。2023年10月，我们实地探访，医院已整修一新定名“玄妙观”，初看还以为是利用古建改造，细看才确认是父亲的原创设计。它充分利用水景，既是功能完善的医院，又是一座雅致的中式庭院。此地开发较少，建筑原貌得以完整保存，应具备申报文保单位的价值。

父亲参与了鄂西地区的三峡五溪、恩施连珠塔公园、宜昌西林公园、十堰紫霄公园的规划设计。腾龙洞、黄金洞、卯洞三大洞，也是父亲致力于推向世界的。他为腾龙洞撰写文章发表在《旅游》杂志上，而当时利川只有两本杂志，被当地人争相传阅，翻得卷边掉页快要散架，他们没想到，一个外地建筑师会对利川有如此深厚的感情。

2011年，我陪父亲一起去利川，以前

他总说鄂西人热情，我还暗地里觉得他是“吹牛”。可到了那里，我才真正体会到，从普通村民到州长，都对他敬重有加。那天我们从腾龙洞往独家寨走，向一位农民问路，对方一下就认出父亲，连忙说：“哎呀，您是张教授，我带你们去！”很快就到了

独家寨。当地百姓就是这样质朴，你为他们做一点点事，他们就会铭记于心万分感激。可他们不知道，父亲之所以如此用心，是为了报答他抗战时期在恩施读书时鄂西人民的养育之恩。

前几年，唐崖土司遗址与湖南黄龙洞等景点联合申遗成功，而在唐崖土司遗址前期的推广宣传中，父亲也主动付出很多努力。只是现在很多地方的旅游开发不免有些“过头”，失去它原本的古朴。父亲生前也有这样的感慨，他费心推广一处，就有人“破坏”一处，搞得面目全非，让人无可奈何。

父亲的建筑人生，从军工到民用，从住宅到校园，从医院到剧场，从古寺到公园，从城市到山野，留下了许多建筑与规划。他不追名、不逐利，只凭一颗匠心，为城市、为百姓，造好用、好看、经得起时光考验的房子，做脚踏实地、惠及民生的规划。这些建筑与规划，就是他最沉默也最永恒的丰碑。

张眺，张良皋女儿，退休前为武汉市第十四中学教师；雷敏功，退休前任武汉市第一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笔墨人生七十载 听鸟问花未了情

◇ 魏金修（口述） 银 华（整理）

昆明昙华寺二殿门额上各有一匾，前匾“听鸟说甚”，后匾“问花笑谁”，寥寥八字，禅味深长，深得我心。艺术这条路，说到底，就是一辈子俯下身向自然万物虔诚学习，转过身向内心深刻追问求索的过程。

鞋样、沙地与墙上的画

我出生在湖北公安，古称孱陵，又叫梅园。那里是真正的“水乡泽国”，枕江面湖，号称“百湖之县”。家乡很美，但也很苦，我两岁那年，就赶上了1954年那场惊心动魄的荆江分洪。听老人说，大水过后，房屋所剩无几。可公安人骨子里有股劲儿，乐观、爽朗、不服输。水退了，就种田；农闲了，就筑堤。这种与自然相伴相争的生活，早早就在我心里种下了对土地、生命最原始的热爱与敬畏。

我的第一个美术老师是我母亲，她不识字，是地道的农村妇女，但手巧得很，一家人的鞋，都是她一针一线做出来的。最让我着迷的，是纳鞋底、绣鞋垫时，她用笔画上去的那些花样。有时是几片叶子、一朵小花，有时是只简简单单的鸟。这些东西都没有范本，全在她心里。在煤油灯昏黄的光晕下，看母亲抿着线头专注描画，我觉得那真是世上最好看的模样。那些朴素的纹样，是我对图案和美最早的印象。

真正看到“画”，是在邻居一位大哥家。他比我大十几岁，当兵复员回来，喜欢写写画画。他用毛笔画鲤鱼、画小鸡、画荷花，然后贴在自家堂屋的木板墙上。白纸黑墨，一下就让那面土墙生动起来。那是我童年最向往的地方，一有空就溜过去，仰着头看，心里琢磨，常常入神，直到母亲站在家门口，拖着长音喊我的小名，才恋恋不舍地跑回去。



魏金修

后来，我找到了自己的“画纸”——长江边的沙滩。那时常和伙伴们去江滩放牛，牛在吃草，我们就在一旁玩耍。我玩的方式有点不同，喜欢捡根直溜的树枝或木棍，在平整的沙地上画看见的东西：岸边一丛野菊花，天上飞过的一行白鹭，或者低头喝水的老牛。沙地松软，线条可以画得很流畅，但一阵风过，或傍晚的潮水漫上来，一切痕迹就消失了，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那种毫无负担的涂抹，自由又痛快。

礼堂“黑画”与铁桶里的夏天

19岁那年，我离开家乡来到武汉，招到湖北省政府招待所工作，当服务员。对一个乡下孩子来说，能进省城，在“省里”单位上班，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我珍惜这份工作，做事勤快。心里那个画画的念头，也像埋在土里的种子，遇到点雨水就要冒芽。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招待所大礼堂。那是一个特殊年代，礼堂里挂满从各处收集来的中国画和书法，作为“黑画”集中起来供

人批判。可我走进去，一下子就被钉在了原地。那些山水、花鸟、书法条幅，在我眼里非但不“黑”，反而焕发着一种令我心跳加速的光芒。我尤其记得一幅荷花，墨色淋漓，荷叶仿佛能滴出水来。还有一幅小鸟站在石头上，憨态可掬。它们和我小时候在邻居大哥家墙上看到的画，气息相通，但又精妙、深厚得多。那是一种完全超出我经验的美。

我像发现了宝藏，一有空就往礼堂跑，一遍遍地看，心里默默地记。线条怎么走，墨色怎么分浓淡，东西怎么摆布。光看不够，我想学。可那时相关的书籍是“四旧”，非常稀缺。一个同样喜欢文艺的室友，利用关系从图书馆借来一本《花鸟画技法》。书不能久借，怎么办？我找来废弃的一种打印纸，半透明，韧性好。到了晚上，把每一幅图、每一行说明文字，一点不漏地描摹、誊写下来，那是我生平第一本“自制画谱”。

武汉的夏天是著名的“火炉”，宿舍里闷热，蚊虫成群。我找来一个废弃的铁皮桶，洗干净，盛满水。画画的时候，就把双脚浸在凉水里，既能解暑，蚊子也咬不着。

无数个夜晚，我就这样度过，一笔一划临摹书上的白描鸟雀，试图理解那一根根线条何以能勾勒出羽毛的质感、鸟的神态。常常画到凌晨两三点，躺下不到三四个小时，又起来上班。那种纯粹的、不带任何功利的喜欢，像一团火，燃烧着自己，也照亮了那段单调的青春。

俯首事贤亦耕心

后来工作调整，我被派去管仓库。那是一个堆满各种杂物、被服、用具的大房间，平时少有人来，杂乱而冷清。

我花了好大力气，把堆积如山的物资分

门别类，重新码放，硬是腾挪出一块方寸之地。搬来一张旧桌子，摆上笔墨纸砚，这里就成了我的画室。在偌大的武汉，我找到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精神角落。

纸张颜料都是消耗品，我那点工资捉襟见肘。我想了个主意，鼓起勇气去找管后勤的领导说，我可以用业余时间，免费为招待所的会议室、客房画一些装饰画美化环境，只需要单位给我报销一点最基本的材料费。领导看了看我，大概觉得这小伙子想法挺特别，居然同意了，批给我500块钱。

在1970年代，这真是一笔“巨款”，我跑去文具店，抱着绘画用品回到仓库画室，觉得无比富足。招待所里，渐渐挂上了一些我的画，虽然稚嫩，但每当听到客人随口夸一句“这画有点意思”，心里能偷偷乐上半天。

一次，一位来开会的老同志，看到我在工作间隙画画，驻足看了一会儿，聊了几句。过几天，他托人带话，说介绍一位朋友给我认识，是位懂画的老师。就这样，我认识了李国俊老师，他当时在小学教美术，家学渊源，为人谦和。他是我艺术上真正的启蒙恩师，不仅教我基本的笔墨道理，还带我拜访张振铎、汤文选等湖北画坛前辈。从前只能在心里仰望的名字，忽然成了眼前可亲可敬的长者，我的艺术视野，像推开了一扇沉重的门，陡然开阔。

为了进一步夯实基础，我考入湖北省美术学院系统学习深造，造型能力、色彩感知和美术理论修养得到了全面提升，为日后的创作打下了更为坚实的根基。

1980年代中期，一个机会落在我头上。省里成立老干部书画协会开展文化活动，需要一名懂业务、能组织的专职工作人员。因为我一直在省直系统，加上多年画画，有点

小小“名气”，组织上把我调了过去。这一去，就是整整10年。

这10年，是我人生中极其重要的沉淀期。我的工作，就是为那些退下来的老同志服务：组织笔会、聘请老师、布置展览、联络协调。这些老同志阅历丰富，很多人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

这个岗位，工作表面上平淡琐碎，却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平台和极其宽松自由的环境。我不再需要躲在仓库偷偷画画，可以名正言顺地研究和创作，并能得到最直接的高水平交流和指点。在这里，我完成了从单纯临摹、习作到尝试真正“创作”的关键转变。我的一张带有现代构成感的《猎神》，就是在这期间创作，并入选全国美展的。

美术学院里，找到自己的“光”

进入湖北省美术学院，成为专职艺术家，是我艺术人生梦想般的转折点。从业余爱好到专业创作，这道门槛很高，我为此努力了多年，过程颇多周折。当我终于接到调令时，已经40多岁。兴奋之余，是沉甸甸的压力，在美术学院这样的专业机构，最终要靠作品说话。

在这里，我有幸得到周韶华、汤文选、冯今松、鲁慕迅、陈立言等诸多前辈老师的亲身教诲。他们不仅在创作上给了我极大的指导与肯定，更以其深厚的艺术造诣与人格魅力，深刻影响着我的艺术道路。

进了画院，像是打开了一扇门，创作上有了“开挂”的感觉。周围都是专业同行，交流切磋的氛围浓厚，我创作的欲望和思考，也变得更加清晰和迫切。我开始有意识地追问自己：你到底想画什么？怎么画？

我画《秋颂》，想表现的不是文人画



《有朋自远方来》

里常见的萧瑟秋意，而是童年记忆里江汉平原那无边无际金黄灿烂的丰收。我把秋天的菊花、红果、葡萄、枇杷，这些本不同同时同地出现的東西，用饱满甚至浓烈的色彩，精心安排在一个画面，构图饱满，富有装饰性和视觉张力。这幅画和小时候看到的传统花鸟画很不一样，我吸收了一些西画的色彩和构成理念，但内核涌动的，是对脚下那片土地最深厚的情感。这让我初步尝到探索的滋味，所谓创新，未必是凭空造个新东西，或许只是用新的方式，说出自己心里最熟悉、最真诚的话。

2007年，我创作了《有朋自远方来》。这个念头来自《论语》开篇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想表现那种故友重逢、心中敞亮的温暖和喜悦。画面主体是瓶中的百合与野花，但我的心思全在那一束“光”上。我大胆地在画面右上角，设计了一束从窗外斜射进来的阳光，打破了画面的平衡，带来了动感和暖意。这束光，不是西画里科学透视下的光影，而是我用中国画留白和渲

染的意匠“造”出来的，是心中的“暖光”“喜光”。这幅画后来在第四届“全国画院优秀作品展”获奖。这份认可，像一剂强心针，让我更加确信中国画的笔墨语言，其边界远比想象中宽广。

我的目光和笔触，始终没有离开生我养我的农村。我很感念家乡“公安三袁”的文化血脉，“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八个字，像一盏灯，告诉我艺术最可贵的是那份发自内心的真诚，是勇敢地表达独一无二的自己。

我画“农事系列”，专画那些登不了大雅之堂、却哺育了世世代代的庄稼——棉花、玉米、黄豆、南瓜。画《祥云暖天下》的棉花时，我在画上题款：“上苍赐人衣被，温暖人间众生，首推棉花，实可谓天下第一美丽之花。”在我眼里，棉花朴素无华，却关乎天下温暖，它的美，是至大至朴的。画《耕读传家》，我组合了南瓜、书本、母鸡和小鸡。大南瓜是劳作的收获，书本是知识的象征，母鸡带小鸡则是家族血脉与美德的



《祥云暖天下》

传承。那只独自跑向门外的小鸡，是我特意安排的，寓意着“读万卷书”后，更要“行万里路”，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画这些的时候，我眼前总是浮现出父母在田里劳作的身影，和乡亲们憨厚的笑容。

为了不断汲取活水，我常常回到自然中去，尤其爱去神农架写生。穿行在山涧路旁，那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花野草，在石缝里、溪水边，自顾自地开得热烈。它们不需要任何人的欣赏和命名，生命本身就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我的“神农本草系列”，就是想留住这股子山野间的生气。写生时，我不再追求纤毫毕现，而是抓住对象最打动我的那一股神韵，快速捕捉，意到笔随。

听鸟问花未了情

艺术之路的耕耘，也收获了社会的回响。2014年11月，在湖北省图书馆，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学会、湖北省文化厅等七家单位主办的“魏金修画展”隆重举行。展览分为六个系列，展出作品106幅，得到了美术界同仁、领导和广大观众的高度认可与广泛好评。开幕式上，周韶华老师鼓励称我为湖北花鸟画的领军人物。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尹汉宁在讲话中评价道：继承传统，紧跟时代，注重借鉴，关注生活，涵养人文，技法娴熟，悟道很深，成果丰硕。这份肯定，是对我半生求索的莫大鞭策。

回头看看来路，我从一个在长江沙滩上用树枝画画的放牛娃，到走进美术学院的专业画家，这条路弯弯曲曲，走了大半辈子。支撑我走下来的，最开始是懵懂的爱，后来是沉静的责任，归根结底，是心里总有一股冲动，想把眼睛看见的、心里感受到的那



《芦苇小鸟》

些美好、那些深情、那些生命的坚韧，用笔墨留下来，说给人听。

如今，我依然习惯时常走进山野，让草木清气洗涤心胸；也依然享受画室面对一张白纸的那份最初宁静与期待。听到不知名的鸟叫，看到墙角悄然开放的小花，我心里还是会咯噔一下，涌起那种童年般的好奇与感动。

我愿意就这么一直画下去，听下去，问下去。笔墨是我的拐杖，也是我的船，载着我，继续在这人世间，寻找美，也寻找自己。

魏金修，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学会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湖北书画院副院长，武汉市文史馆馆员

张之洞幕僚程颂万办洋务

◇ 刘 飞

清末民初名人徐珂在《康居笔记汇函》中，赞扬他的朋友程颂万（字子大）在武汉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办洋务，包括办学校、兴实业、修江堤等，功劳卓著。陈寅恪的祖父陈三立和著名维新派谭嗣同，都与程颂万有交往。如陈三立《程子大武昌鹿川阁图·其二》“老俱赁庑杂流人，破砚残杯对笑颦”；谭嗣同《题程子大横览图诗》“家国两愁绝，人天一粲然。只余心独在，看汝更千年。世界几痕梦，微尘万座莲。后来凭吊意，分付此山川。”

程颂万何许人也？据《宁乡县志》载，程颂万（1865—1932），字子大（一字鹿川，晚号十发居士），程惠吉之孙，程霖寿之第三子，程颂藩之从弟也。祖籍湖南宁乡竹山湾，生于长沙。

程颂万善词章，在东南很有影响，但他还有“经世”抱负，希望以“事功”闻名于世，1889年参加乡试，因文章“涉时事”而落榜。

1896年，程颂万花钱买了一个“湖北



通判”，因此和武汉结缘。当时，张之洞正锐行洋务。程颂万撰《化学刍议》《士用实义》，上书张之洞和湖北巡抚谭继洵（谭嗣同之父），受到主官的赏识，聘为“抚署文案”，开始幕僚生涯，做出如下实绩。

办学校

1897年，程颂万首创湖北中西通艺学堂，是各省创办的私立学堂中的第一个。他

在通艺学堂内创设“攻木局”，引进新工艺，培养漆匠、木工。

1899年，程颂万任湖北自强学堂提调，主要工作是“督课五国方言（注：原文如此，指英、法、德、俄、日五国语言），归重经术文艺”，负责学堂的语言教育，重点落在传统文化教育。后来，请假回家一年多，张之洞屡次催促回任，特别委任他掌管自强学堂，于是他捐钱升级为知府。

1902年，经张之洞上奏朝廷，改派程颂万任方言学堂提调。当年冬天，20余名学生毕业，包括陈篆、何佩镛、赵恒惕等人。

1904年农历六月，张之洞将程颂万调到湖北高等工学堂任监督，兼管工艺局事务。程颂万请求购买长江岸边土地，选择新校址。在工艺局投产之前，就招收学手艺的学徒，传授机械使用技术，用机械和手工结合的方法改良土货，得到张之洞的同意和支持。随后，程颂万被委派管理安陆船关（水上收税关卡），他把官员的灰色收入予以裁减，用其经费开设船关小学。程颂万还同闽县人陈钰（星五）合办湖北私立翻译学堂，内设印书馆和英东文艺学（校）。

1904年，湖北省推荐奖励办学的有功人员，程颂万因工作实绩显著，名列第一。

兴实业

1905年，程颂万创造铁、木兼用的新式织布机，有宽、窄两种，3个人可以同时管理操作两台机器，一天内可以浆洗成布3匹。他没有申请专利，任别人仿造，没几年全国各处都得到机器带来的好处。他又自行筹集商人资本，创设广艺兴公司，按照造纸、印书、漆、木、竹、绣等行业，呈报商部备案。

1906年，程颂万在汉口创设手工造纸

厂，设在大智门外，有木工厂10个、漆工厂4个、竹工厂2个。工厂实施近代生产技术，使用机械和化工药料，生产速度快且质量“坚致”，工匠达到1000余人。

1907年夏，张之洞将程颂万创设生产的手工机械和漆、木、竹、绣等新机器、新产品，送到北京参加商部劝工陈列所展览，获得“匠心独运”奖。再加上办賑的功劳，程颂万很快以道员候补加赏二品顶戴。秋天，张之洞上奏，委派程颂万总办湖北造纸厂。程颂万订购比利时新式机器，用来造什木绵草，日产量达120石纸，约定29种纸式，用比利时技师操作生产，只有纸式数和约定相符，方付足剩下的机器钱，并由驻上海、武汉的比利时领事签字背书。

1909年春，程颂万被朝廷召见到北京，回湖北后卸去造纸厂厂务，调任善后局会办。

修江堤

1907年，程颂万督修武昌金口大堤及三新矶，是他对武汉的重要贡献，也是他一生重要且饱受磨难的经历。

江堤为前任总督周天爵修筑。1899年冬，张之洞又修筑55里，长堤直达武昌金口。过了六七年，新堤遭到破坏，甘家河一带的陡岸，一百丈的江堤仅存十丈长。堤外受到汉阳蝦蟆矶之冲击，堤内陇湖墙、武泰闸等存在诸多隐患，屏障已不坚固，老百姓担心决堤。

张之洞复上奏，委派程颂万督修金口上游堤工（仍兼领工学堂事务）。程颂万认为，应当先修固江堤加高增厚，将袁家河、甘家河、老关背上、中、下三矶（石滩）区别开来，各矶伸出江中十多丈，有坞环绕；又沿江修石坡，石坡高七丈，长四百一十一丈。

当年农历四月，堤防工程完成，但因江岸陡立，水势险恶，加上使用青沙修筑，迎流辄溃。于是在牛头山凿取乱石，抛到江边保护江堤，等到冬天枯水期再修坞堡。然而，坞堡逼近江心，排船钉桩，缚石沈木，所用掉的石头、木材不可胜计。

屡败屡筑之后，程颂万创造“横牛扯马”之法，绘制图纸，详细解说，亲自督促一线人员紧急办理，不惮艰险。1908年农历三月，上、中两矶坞堡修成，坞堡宽三丈，内坡三丈，外坡接近十丈，用沉舟的方法放下去的石头，远远堆积在江中。按照规定，石矶的基础用铁机打桩，深一丈以上。四月基础才筑成、坡刚修好，而洪水就到了。年底，按照总督赵尔巽的命令，省去老关背以下的矶工，仅堆放乱石500方以抵御洪水之险。

此前，上、中两矶修筑即将完成，程颂万被嫉恨之人中伤。考虑到下矶关系全局利在百世，程颂万毅然借款兴筑下矶，同僚都为他担心。

《湖北通志》记载，1909年春，江堤工程完成，总督呈报核销费用，朝廷三司核议不准报销。汛期到了，工程被淹没，仍让程颂万留职做防护，冬天水涸进行修补，也不予验收。程颂万不得已，以至于卖尽家人的衣饰来付工钱、材料费。第二年，瑞澂做湖广总督，调查程颂万的罪状，但没有证据。等到冬天水涸，三矶屹然而立，才命令将工程予以验收，全部费用共计二十二万五千两白银。

虽然修筑工堤的费用解决了，但造纸厂购买机器和建筑厂房的费用三十万两白银，以及因补修的借款万余两白银，一直没有下发，到冬天就不了了之。程颂万办公司兴实业的意愿，也消磨殆尽。

工诗词

1911年农历正月，程颂万请假回家，拜谒蛟湖祠的祖先墓。三月，聘为岳麓高等学堂监督。随后，辛亥革命成功，学堂改制，回武汉蛰居二年。1912年正月，应湖南都督汤芑铭之聘，前往长沙编纂官书，不久辞还。1913年在武汉刊定《巢词集》，后又病居长沙数年。

1918年，程颂万为躲避战乱，又回武汉居住，友人集资在武昌为之修筑鹿川阁，前面所言陈三立为之写诗就在其间。数年后又移居上海，靠出售书画为生。

程颂万曾师从杨彝珍，年轻时与阎镇珩、易顺鼎、何维朴、王景峨、景崧、赵启霖、谭献、邓绎、邓辅纶、郑襄义、陈三立、梁鼎芬等诗友往来，诗词日工。50岁后撰《程典》。在上海，与朱古微、陈曾寿、郑孝胥、况周仪、潘飞声等立社唱和。刻有《鹿川诗文集》《十发居士全集》《十发庵集字楹帖》《弢斋诗录》《楚望阁集》《鹿川近稿》《鹿川田父集》《石巢诗集》等。

程颂万为人和厚，不激不随。初入谭继洵幕府，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勃兴，多人都想攀附。谭嗣同欲援引，程颂万不予回应。在湖北做幕僚十余年，没有正式官职，亦无愤郁之意。晚复锐志于古文礼经，而洞见西学之弊，以为“纵欲嗜利好杀”。

1932年12月4日，程颂万68岁卒，武昌陈宝忠为之撰有《十发先生事略》。

刘飞，江苏省淮安市纪委监委派驻第二十纪检监察组干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江汉关博物馆建设纪略（下）

◇ 李笙清 彭 建

武汉海关迁址后加快建设

2012年7月，武汉市政府与武汉海关正式签署置换协议。11月底，武汉海关整体迁址金银湖，江汉关博物馆建设提速。12月18日，“武汉历史文化风貌街区保护工程暨江汉关博物馆建设项目启动仪式”在江汉关大楼举行，市长唐良智宣布项目正式启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彭丽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永新出席启动仪式，副市长刘英姿主持，标志着江汉关成为武汉历史文化风貌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3年2月28日，江汉关大楼举行交接仪式。2月25日，唐良智市长召开会议，要求按照专题博物馆的定位，进一步深化陈

列方案。此时，市文化局已经完成陈列方案编制和文物资料征集等工作，并对江汉关大楼本体初步开展检测。

着眼于把江汉关博物馆建成“全国一流博物馆”，筹建处制作完成基本陈列文本，名称从《艰难的跋涉——武汉城市近代化历程》定为《寻踪百年——武汉城市近代化历程》。同时，辅助陈列全面展示江汉关的建关背景、关贸业务、税款征收及武汉人民争取海关主权的斗争，以及汉口租界殖民历史，延伸到武汉近代的各方面。

为了充实陈列大纲，制作小组前往湖北省档案馆、武汉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宜昌市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等地，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获取了一批图片、资料，丰富了展陈内容。



基本陈列大纲完成后，多次召开专家咨询会和论证会，邀请章开沅、冯天瑜、皮明麻、严昌洪、袁继成等省市知名专家学者进行论证，得到一致肯定。章开沅评价该方案说：“从指导思想、主体构思及具体布局乃至文字说明都比较好，是一个颇具水平、全面系统，把思想性、真实性、艺术性与科技性密切结合的好方案。”

武汉海关迁址后，江汉关大楼文物保护工程随即展开。大楼始建于1924年，内部装饰及外部墙面出现不同程度的毁损，首要任务是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进行文物维修，恢复当年原貌，让大楼作为第一展品呈现在市民面前。同时，按照《文物系统博物馆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级别的规定》等相关规定，对大楼进行本体保护加固和安全消防设施设置，以确保对外开放的需求。

江汉关大楼勘测设计方案，委托湖北省文保中心编制完成，获国家文物局批准。维修保护方案及项目建议书，委托新纪项目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及上海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编制，获武汉市发改委批准立项。

江汉关大楼占地面积1499平方

米，建筑面积4300平方米，高40.6米，共4层。根据《江汉关大楼原貌恢复及整体使用方案》，整幢大楼全部用于博物馆展陈及业务用房，具体分布为：

一楼区域：武汉海关办证大厅，按江汉关报关大厅历史原貌复原；北面4间辟为展室，布置基本陈列第一、二单元。

二楼区域：税务司、秘书科办公室复原，其他房间布置基本陈列第三、四单元。

三楼区域：将东南面的4间辟为临时展厅，其他7间用作接待室、图书资料室、档案室等。

屋顶平台：复原，供观众参观。

钟楼：钟楼内外场景及设施复原，请亨达利钟表店对大钟进行维修，确保开馆时顺利运行。

底层区域：设置多功能厅、游客中心、文物库房、监控室等业务和办公用房。

通过以上布局，最大限度地发挥江汉关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展示、社会教育等诸多功能，满足市民对江汉关博物馆的期盼与需求。



税务司办公室复原场景

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基地

2013年11月4日，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来江汉关大楼实地调研，在详细了解布展设计后强调：江汉关作为武汉近现代史的标志性建筑，一定要在保护好原貌的同时研究利用好这栋大楼，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基地的重要部分，紧扣这根红线，设计好武汉城市历史展。“就是要让参观者看完展览后，切身体会到我们是如何从苦难深重的过去走到今天，深刻明白一个道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

筹建处立即对基本陈列大纲文本进行深化设计，同时扩大文物征集的时代面。2014年4月19日，再次召开专家咨询会，邀请湖北省党史学会副会长方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玉堂，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严昌洪，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陈芳国，武汉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刘庆平，原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周斌等党史、地方史专家，对陈列方案的进一步完善进行探讨。4月20日至5月5日，方案编制小组结合专家意见，重新搭建新的框架结构，征求武汉市社科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张笃勤及方城、陈芳国、周斌、刘庆平等专家的意见，对原陈列方案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修改。

根据阮成发书记的要求，陈列内容的截止时间由武汉解放延伸至21世纪新时期，多达数十年。筹建处结合市委宣传部《武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基地建设设计大纲》，在重点反映武汉走向近代化

的同时，注意表现汉口被迫开埠、设立租界的屈辱历史，突出广大人民反对列强殖民侵略、争取国家主权、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实践，展示城市演变中“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将江汉关博物馆打造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基地。

一是展览标题，由《寻踪百年——武汉城市近代化历程》改为《江汉朝宗——武汉城市现代化历程》，更切合时代发展脉络。

二是框架结构，将第一、二单元合并为第一单元“汉口开埠——武汉城市现代化的开端”，使“汉口开埠”与“租界建立”紧密相连，以汉口被迫开埠、江汉关设立的屈辱背景为起点，突出反映武汉城市现代化的开端及“国中之国”的租界如何践踏中国主权、文化渗透、经济控制的辛酸记忆，让观众铭记历史，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将第三、四单元和五单元的第一部分合并为第二单元“艰难跋涉——武汉城市现代化道路的曲折探索”，主要反映武汉在城市现代化道路上的三次探索，即封建阶级内部的开明派代表张之洞推行的洋务新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正确



武汉市委常委冯记春向江汉关博物馆馆长朱莉授牌

道路，既有时间上的递进关系，又能让观众从中明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取得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彻底胜利；将第五单元的第二、三、四部分合并为第三单元“走向辉煌——武汉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与腾飞”，时间跨度为100年（1949—2049），全景式展示新中国建立后，武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跨越式发展时期的巨大成就，以及对“2049大武汉”的美好展望。

三是内容选择紧紧围绕屈辱、抗争、发展这条轴线展开，依次推进，环环相扣，时间节点清晰，内容更为紧凑。为突出“依托海关建设博物馆”这一特色，在第一单元三部分中，特意重点设置“外籍税务司把持下的江汉关”，除了讲述江汉关设立的前因后果及外籍税务司体制下的屈辱一面，还系统介绍了近代中国海关的基本职能和相关业务，让观众了解中国近代海关的相关信息。

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为主线、以武汉近现代城市发展为脉络，略化海关和近代贸易、市民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强化武汉在城市现代化道路上的不懈探索。在城市变迁中，从武汉三镇选取同一地点的新旧照片进行“旧貌新颜”的直观对比，并增加了重点工程建设、市民幸福宜居、武汉对外开放缔结国际友城、共和国立交桥等，以彰显“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主题思想。

在尾厅，特意设置了大型电视墙，制作专题片反映武汉城市解放以来取得的一个个重要成就。

考虑到江汉关博物馆依托旧海关建馆的特殊性，场景复原较多，同时设计《江汉关复原陈列》方案。其中，报关大厅作为江汉关关贸的主要业务所在地，为复原陈列的

主题亮点，对各道工作流程依次复原，注重民国元素，使观众一进来就产生置身于民国海关的真实感。大厅入口一侧设置电子触摸屏，输入与报关大厅相关的文字、图片资料，作为报关大厅复原陈列的补充内容。

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武汉城市现代化发展这一板块扩大文物征集，征集小组多次前往武钢、武重、武船、武锅等“武字头”重点企业，走访老领导、老工人、老专家，征集到一批实物、照片及资料，并请电视台抢救性拍摄录像资料，制作成短片循环播放。

此外，在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图书馆、武汉市档案馆、武汉市委党史办和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市规划局等处寻找相关资料；前往赤壁赵李桥、羊楼洞茶厂和咸宁博物馆等地考察，寻找晚清至民国时期湖北砖茶贸易线索，搜集到一批实物资料。

修复江汉关钟楼

江汉关钟楼从主楼平台至顶层共4层，钟面直径3米，机件系瑞士蔡氏土麦士钟表厂制造，报时装置系美国安达森迈尔公司制造，安装由汉口的达卫长和亨达利承担。顶层一座六方形装置，即由7个不同音阶的铜钟组成的音响室。第二层机件室。第三层时针室，时针长1.5米。低层大厅摆砵室。塔钟播放的报时曲，与英国大本钟一样为《威斯敏斯特》，最初每一刻钟报时，后换成电子钟。

2013年6月8日，江汉关塔钟修复及复制专家论证会召开，邀请中国钟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高级工程师王宗纲，江汉关钟楼第四代护钟人、钟表维修高级技师郭亦农，烟台市高级工程师于洪运，原湖北省质量监督局高级工程师万学桐，原武汉市文化局副

巡视员周彰等全国塔钟、计时专家参加，达成共识：江汉关塔钟承载着武汉的城市记忆，遵循原钟“修旧如旧”的原则，结合时代、环境及老百姓的需求，借助高科技手段，在内容、形式、声音等方面尽可能保持原汁原味，在细节上最大程度恢复历史原貌。专设塔钟陈列室，根据空间复制5:1微型塔钟（约2.5米高），以此开发塔钟

旅游产品，提升江汉关的传播、辐射效果。

同时，考虑到钟楼不易参观的特殊性，按原貌缩小制作了一个模型，在江汉关基本陈列中展示，让观众近距离了解钟楼的相关知识。

为配合开馆营造氛围，大力传播江汉关文化。

一是编辑出版《百年江汉关》一书，根据向元芬研究员的提议编写，以68篇文章系统介绍江汉关的前世今生及相关历史事件，2015年3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图文并茂，150余幅图片部分来自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为首次发现。

二是制作《江汉关的一天》影视短片，主要反映江汉关报关、缉私等基本业务，有助观众认知近代中国海关的一些基本职能。

三是录制“口述历史”短片，邀请武汉教育电视台拍摄，通过武汉海关老人、历任关长、武汉文史专家的“口述历史”，以视频方式记录他们对江汉关史、武汉城市史的独有记忆和见解。其中，海关老人甘胜禄讲述江汉关历史和人事管理制度，崔祖元讲述江汉关与长江航道管理；冯天瑜教授讲



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与学者冯天瑜、严昌洪共同开馆

述开埠设关与武汉城市转型；皮明麻教授讲述张之洞与近代武汉；袁继成教授讲述汉口租界；陈锋教授讲述近代武汉经济发展与变迁；何祚欢先生讲述近代武汉风俗等。可惜的是，原定徐明庭先生讲述《汉口竹枝词》中的武汉风情，因其身体原因终未录制而留下遗憾。

2015年12月28日上午，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与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冯天瑜、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严昌洪两位先生，沿着台阶拾级而上，共同开启江汉关博物馆厚重的大门，宣告对社会公众开放。

江汉关大楼，这座饱经沧桑的近代优秀历史建筑，在经历了91年风雨沧桑后，以展示武汉城市现代化波澜壮阔历程的方式，重新出现在社会公众眼前。

李笙清、彭建，武汉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武汉航空轨迹追寻（七）

◇ 刘宝森

武汉会战时期的地面防空

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中国的军事、政治中心，地面防空部队主力集中配置于武汉附近，同空军一道肩负保卫武汉领空的重任。

1936年10月，武汉防空筹备处成立后，在湖北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配合下，一方面调配专业人员，一方面发动民众，迅速组建起以武汉为中心的三级防空监视网。在蒲圻、大冶、浠水、宋埠、花园、皂市等地建立6个防空情报支部。在防空情报支部之下，于通城、崇阳、嘉鱼、通山、龙港、阳新、黄梅、漕河、英山、罗田、麻城、黄安、礼山、应山、

随县、安陆、京山、钟祥、杨家湾、天门、潜江、沔阳等地设立28个防空监视队部，于咸宁、武穴、团凤、长轩岭、孝感、长江埠、沙市、监利等地建立8个独立监视队部。在监视队部之下，设立195个防空监视哨所，分布在湖北中东部35个县境内。

此外，为使武汉防空监视更趋周密，1936年底以前，在距武汉250公里范围内的平汉、粤汉、省属长途电话和电报线路的沿线，设立祁家湾、三汊埠、贺胜桥、汀泗桥、黄陂、仓子埠、葛店、皂市、花园等90个补助监视哨所。

针对敌机空袭的不同情况，制定出空袭警报、紧急警报、毒气警报、火灾警报、解除警报。在敌机距武汉150公里时即发空袭

区	警备区					兵力	备注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一区	第一中队	第二中队	第三中队	第四中队	第五中队	步兵 100 名	第一区警备司令部
第二区	第一中队	第二中队	第三中队	第四中队	第五中队	步兵 100 名	第二区警备司令部
第三区	第一中队	第二中队	第三中队	第四中队	第五中队	步兵 100 名	第三区警备司令部
第四区	第一中队	第二中队	第三中队	第四中队	第五中队	步兵 100 名	第四区警备司令部
第五区	第一中队	第二中队	第三中队	第四中队	第五中队	步兵 100 名	第五区警备司令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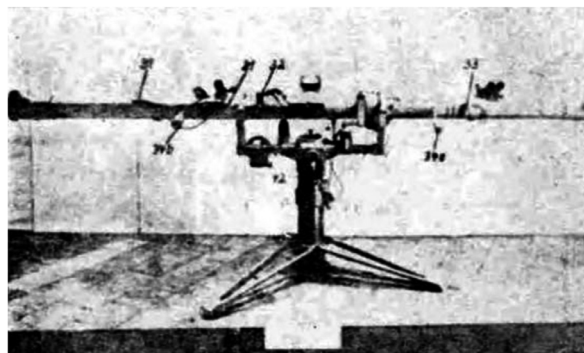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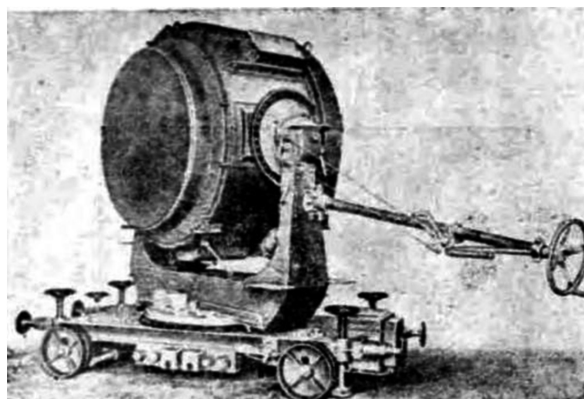
武汉防空汉口警备区域兵力分配表和水陆配备图

警报, 80 公里时即发紧急警报, 为市民避难、防护团出动、防空部队拦截赢得充分准备时间。当空袭警报发出后, 立即实行交通、灯火、音响管制, 军民进入防空临时戒严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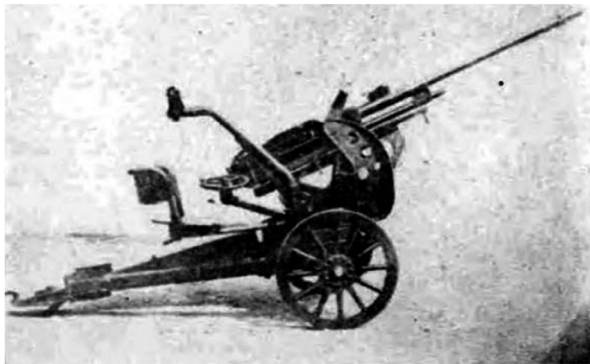
1937 年, 由于前线战事激烈, 中央无暇顾及武汉, 武汉号召三镇各界人士筹款购置高射武器, “政府既兼顾未迭, 民众宜力谋自卫”。11 月 2 日, 湖北省政府召集三镇各界人士, 在汉口新生活俱乐部举行会议, 筹集防空建设经费。经武汉各界摊款、征收房租、省政府押借垫付等, 筹足经费 200 余万元。其中, 汉口工商界捐款 165 万元。最终购得麦德森 20 毫米机关炮 18 门、匈牙利 40 毫米高射炮 8 门及附属各种弹药, 于 1938 年 4 至 5 月间陆续运抵武汉。

武汉防空司令部编成高射炮大队, 下辖 5 个高射炮连及通信排、修械所。第一、二连为匈牙利 40 毫米高射炮连, 每连 4 门炮; 第三、四、五连为麦德森 20 毫米机关炮连, 每连 6 门炮。高射炮大队作为武汉防空基干部队, 由武汉防空司令部直接指挥, 与临时配属的中央高射部队及照测队等, 共同担任武汉市区的防空任务。

南京、徐州失守后, 前方高射炮部队陆续集中于武汉附近, 配备高射部队有 76.2 毫米高射炮三连、75 毫米高射炮一连、12.7 毫米高射炮一连、20 毫米小炮一连及照测队等。武汉外围的田家镇、马当、湖口等处,



防空探照灯和测高仪



1930年代的高射炮



武汉空战中用机枪打日机

配属 75 毫米、37 毫米和 20 毫米炮一连或二连。高炮第四十四团第五营的两个高射炮连配属第九战区，先后于九江、马头镇、半壁山、阳新等地，担任野战炮兵之掩护。至此，武汉的防空力量得到较大增强。

1938 年，武汉市区遭受日机空袭至少有 28 次，均有地面部队参加作战的记载，给敌机造成很大威胁。1 月 4 日，“敌机即行侵入武汉上空投弹数枚，经我高射炮及机枪相继射击，至下午二时五十分敌机遁去”；2 月 18 日，“当敌机侵入上空时，我高射火器密集射击，敌机不敢低飞久留，仅于飞机场附近仓皇投弹数十枚”；3 月 28 日，“我高射炮火密集痛击，弹如贯珠，

敌机感受威胁，不敢低飞”；4 月 12 日，“（敌机）续经葛店青山侵入武汉上空，我照测部队猛烈照射，空军奋勇迎击，敌机不敢恋战”；4 月 18 日，“（敌机）于三时许侵入武汉上空，我照空高射炮及空军联合作战，敌机不支，不及投弹，仓皇经葛店向罗田方向窜去”；4 月 29 日，“敌机分批经鄂城葛店青山，于十四时四十五分一部侵入武汉上空，我高射部队猛烈射击，空军向其包围猛击，敌机仓皇在汉阳投弹四十余枚，武昌投弹二枚，汉口投弹四枚后，经黄冈罗田逸去”。

7 月 14 日，“我防空部队事先已有准备，予以猛烈射击，敌机仓皇在飞机场附近投弹后，向东北方向遁去，我并无损失云”；8 月 15 日，“敌机旋窜入上空，企图向机场低飞扫射，经我高射部队猛烈射击，敌机不敢恋战”；8 月 21 日，敌机“甫抵市区上空，即遭我高射部队猛烈射击，敌机不敢低飞，旋即逸去”。

武昌白浒山炮台山高仅 150 米，位于长江由北转西向东的拐点之下，因此扼江而险，被誉为“汉门锁钥”，历来是军事重地。武汉保卫战期间，这里驻守炮兵 45 团，捍卫武汉东大门。



2018 年，作者探访白浒山炮台留影

10月24、25两日，为掩护武汉军民撤退，守军以20余门重炮火力，全力向日军波田支队开火，延缓敌人进入武汉的速度。24日，波田支队先锋抵江桥镇时，遭白浒山炮台及观音山阵地守军炮火猛烈突袭，阵脚大乱后撤10余公里，炮兵伍长田中四郎毙命。次日凌晨，面对敌人携八九式150毫米野战炮及四五式240毫米重型榴弹炮，白浒山炮台毫无畏惧，双方炮火交织。日军气球兵观测引导集中轰击，日海军侦察机也至其上空准备轰炸。白浒山炮台英勇反击，炮击日舰与炮兵阵地，高射机枪迎击侦察机，守军转至掩体与壕沟继续抗战，直至炮台阵地被彻底摧毁。

航空委员会移师武汉

航空委员会是国民政府主管空军及航空建设的最高机关，南京沦陷后迁至武汉。南湖机场指挥中心大楼，由航空委员会空军总站使用。

航空委员会对武汉的空防十分重视，将空军第三、四、五大队和苏联志愿队的两个战斗机大队，集中在武汉地区。中苏战斗机共有50至60架，驻扎在汉口、武昌、孝感三个机场待命，在武汉上空多次与日机拼搏。2月18日击落日机14架，2月28日击落日机12架，4月29日击落日机21架，5月13日击落日机10架，5月31日击落日机14架，8月3日击落日机11架。

2月18日空战，第四大队代大队长李



参加武汉空战的飞行员

桂丹，分队长吕基淳，飞行员李鹏翔、巴清正、王怡等5位勇士血洒长空，英勇殉国。4月29日空战，空军少尉陈怀民烈士的鲜血洒在武汉的蓝天。中共驻武汉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送挽联——“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5月6日，航空委员会派代表慰问陈怀民烈士家属，烈士父亲陈明徽说：“怀民之死，颇得其所，惜其为国家尽力太少。”出生在印尼的归国华侨、第三大队第七中队长吕天龙，毁敌机4架，伤敌机3架，被航空委员会授予抗日英雄勋章。一次空战中他不幸负伤，在武汉医院治疗期间，周恩来前往慰问。

1949年参加云南空军起义的刘汝用回忆：我于1930年考入云南航空学校第三期，1932年毕业，在巫家坝航空队服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们云南航校的31名同学，10月18日由昆明出发，11月3日到南京，向航空委员会报到参加抗日。11月12日，上海失守。航空委员会指令我们于19日撤离南京到汉口待命。12月上旬，航空委员会根据不同技术工种分派工作，仅我一



杭州飞机制造厂大门

人在汉口，分至第六飞机修理工厂。工厂设在汉口中山路黄陂同乡会馆，亲眼目睹4月29日、5月13日的空战，还参加过收拾敌机残骸的工作。

1937年8月，日军开始轰炸杭州。航空委员会将杭州笕桥的国民政府与美国柯蒂斯-莱特公司、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等合资的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迁至武汉。美方人员弃厂而去，留美硕士、工程师华凤翔挺身而出，肩负起厂长职责，主持迁汉工作。所有机器设备先用火车运往芜湖，再由轮船沿长江送至汉口。9月，在武昌南湖机场复建；10月，开始恢复生产。工厂员工达1500余人，修造飞机达128架。

1938年5月，孔祥熙与鲍雷在汉口会晤取得共识，合同期满后，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仍请美方负责经营。由于战事日紧，10月迁往昆明。

在武汉，航空委员会且负责民用航空的建设与发展。1938年3月2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出《议决中法合作经营自河内经香港到广州等航线公函稿》，其主要内容是：交通部提关于李石曾先生与法国航空公司

总经理所订经营河内经香港至广州、河内经昆明至长沙两航线合同草案。中、法合资设立中法航空公司，按照中国、欧亚两公司成例，遵照中国法律办理，经营昆明、长沙等地航线。在此项合资公司筹备期间，由交通部委托法国航空公司先行举办河昆线，与欧亚公司对飞，以6个月为限。6个月后，如中法航空公司尚未成立，须另定办法。法国航空公司经办上列两项航线，由航空委员会于每

次飞航，购包客票及负担保险费各若干成，河港线以一年为限，河昆线以6个月为限，另用密件换文办理。

1938年2月1日，航空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创办《中国的空军》杂志，杂志主编为政治部主任蒋坚忍，原黄埔军校《革命画报》主编梁又铭任社长兼总编辑，陈布夫任副主编。在汉口期间，共出杂志15期。

《中国的空军》杂志第11期，以《人道的远征日本（空战座谈会）》第3至8页，



《中国的空军》杂志

详细介绍中国空军两架飞机于5月20日凌晨3时到达日本九州上空，在日本城市散传单的经过。在文中，黄震遐特别强调，此次出征不投炸弹而投纸弹（宣传单），其性质是非军事的，而是政治与宣传性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对国内、敌国及国际民众的宣传。

《中国的空军》杂志第12期，有一张沈崇海的照片，穿着制服很帅，面容沉静。上面印着：与敌同归于尽的空军勇士，沈崇海遗像。

沈崇海，湖北武昌人，1911年出生。其父是国民政府司法院大法官沈家彝。沈崇海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为中央航校三期毕业生，任空军二大队九队分队长。1937年8月19日，于上海白龙港洋面驾机撞沉日舰，英勇殉国。



沈崇海遗照



在清华大学时与棒球队合影（左二）

参考文献：

[1] 冯钰麟：《抗日战争专题研究：日本航空部队侵华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

[2] 张泰山、徐旭阳：《武汉会战前的武汉防空建设述论》，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3] 宋赞、刘彦波：《全面抗战初期武汉地面防空部队的作战与检讨》，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4] 朱民威：《武汉空战》；杨津涛：《抗战记忆》，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

[5] 杨菁：《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第8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

刘宝森，武汉公交集团退休干部



《中国的空军》杂志刊登沈崇海自传

洪山摩崖石刻桃心“寿”

◇ 张 剑 宋 贝

武昌洪山摩崖石刻是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为南宋荆南参军赵淳庆元元年（1195年）所刻。其中“寿泉”石刻的“寿”字左下方一点，书刻成“寿桃”的模样，颇具神韵。

“寿泉”石刻下有题跋小字，可知“寿”字书法来源于“五华洞壁”。在以往的研究中，认为“寿”字是根据南岳衡山五华洞的石刻拓本摩刻。我们通过实地调查及史料分析，重新判断南岳衡山“寿”字，应晚于武昌洪山“寿”字。因而，洪山摩崖“寿”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为宋代寿文化和中国古代书法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赵淳建东岩阁作《东山赋》

洪山摩崖石刻位于宝通禅寺洪山宝塔周围的山崖上，是武汉重要的历史人文景观。这一带怪石嶙峋，奇石如狮、似虎、像云影。南宋庆元元年，荆南参军赵淳在洪山建东岩阁，将其所写《东山赋》《东岩阁记》刻于山石之上。笔者通过实地调查，共发现“寿泉”“东山赋”“东岩”“云扃”“栖霞岩”“清啸”“翠屏”“狮子峰”等8处，分别用隶书、楷书刻于各处奇石之上。

赵淳《东山赋》

石刻记载：“山固多嘉木，由翦伐无时，使不得藩息，以军营视此，实为主山，乃禁樵采，封植养护，则大者挺然干霄，小者丛生攒立矣。因即



山之阳得胜处，偶拾余材，架屋为阁，榜曰‘东岩’。取其石秀而木茂者，又得数所，曰云根、云肩、伏山……此又状其石而名之也。奕局、琴几、石鼓、笔床，因其天成，粗加断削。循山之巔至黄鹄亭……与东岩相为表里，后之来者，愿不以人废。阁成于庆元初载重午日。将右军河阳赵淳清老谨识。”

由《东山赋》可知，赵淳在东山（今洪山）建亭、刻石的缘由。山上各处天然形态的奇石稍施斧凿，依其形态而命名。而“寿泉”刻字在一形似寿桃的奇石之上，“寿”字左下角的一点书又刻成桃心状，与其寿桃形状的奇石载体相得益彰，或以此得名。

“寿泉”石刻，现存“寿”“泉”两个大字及题跋小字近百字。“寿”字宽66.5厘米，高50厘米，阴刻隶书；“泉”字宽54厘米，高65厘米，阴刻篆书。“寿”“泉”两字的大小、字体都不甚协调，而且篆刻“泉”字的位置，原为篆刻“寿”字的题跋，由此推知“泉”字为后人补刻。

赵淳为襄阳抗金主帅

“寿”字题跋内容风化较为严重，仅能辨识20余字。根据清代历史地理学家、金石学家杨守敬《湖北金石志》记载，题跋原文为：“有士大夫政和甲午岁游岳，见五华洞石壁上有寿字，体法不凡，人莫能识，乃以千钱募工得纸本以归。因刻石以传世，新定赵史君茂嘉复模于郡斋，淳偶得之，不敢藏于家，刊诸东岩石上，期与好事者共之，庆元初年乙卯岁中秋日，河阳赵淳谨跋。”

题跋叙述了北宋政和甲午年（1114年），有士大夫“游岳”，将“五华洞石壁”一书法独特的“寿”字，制成拓本并刻石而传世，

南宋赵茂嘉再次临摹。后来，南宋赵淳偶然获得摹本，镌刻于奇石之上，以期与大家共赏。

题跋提及的二次临摹作者赵茂嘉和题跋作者赵淳，史书上均有一定记载。南宋徐元杰（1196—1246年）《嘉遯赵公赞》载：

“公名不遯，字茂嘉，自幼有声，能文，登进士第。”据江西铅山县《赵氏族谱》载：

“赵不遯，士初子，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癸未木待问榜进士。”《铅山县志》载：

“兼济仓在天王寺之左，直华文阁赵不遯所立。

初慕兼济平糶之意，以穀贱时糶，至明年穀贵，损价以糶。淳熙十五年（1188年）米始百斛，岁时益增，后至千斛。意欲自少至多，自近及远，不为立额。”《江西通志》

卷八十五载：“赵不遯，直秘阁登进士，为清湘令，无异韦布尝置兼济仓，冬糶夏糶间里，德之绘像祠焉。”由此可知，赵不遯，

字茂嘉，江西铅山县人，生当在南宋早中期。按史载，赵茂嘉曾任江西提刑，后任直秘阁

郎中。

《宋史》虽未给赵淳立传，但由于赵淳

在抗金过程中地位极其重要，是南宋“开禧北伐”年间的襄阳守城主帅，所以对赵淳也多有提及：“开禧二年（1206年）四月……

鄂州都统赵淳兼京西北路招抚使，江陵副都统兼知襄阳府皇甫斌为副使。”《宋史·宁

宗纪》载：“开禧三年（1207年）六月，赏守（赵淳）襄阳之功。”赵淳幕僚赵万年

著《襄阳守城录》载：“（金军）屯兵襄阳城下，围城三月，大战一十二场，水陆攻劫三十四次，九设攻城之机变，为赵淳九拒之，

不克而去”“吾（赵淳）家世受国恩，先祖帅河阳，举家为虏所杀，独吾父得免。吾今

帅襄阳，值虏入寇，当誓死报国”。再结合题跋“河阳赵淳谨跋”和《东山赋》“将右

军河阳赵淳清老谨识”，可知赵淳，字清老，祖籍河阳即今河南孟州市，生当在南宋中期，其在武昌洪山所刻“寿”字石，应在他赴任襄阳之前。按史载，赵淳鏊刻洪山摩崖时任荆南参军，驻军在武昌洪山附近，后任鄂州都统就任襄阳。

洪山“寿”早于衡山“寿”

从石刻题跋内容可知，洪山“寿”字的来源和传承的时间链条证据清晰。此桃心“寿”字体法独特，根据史料文献和考古调查情况，现全国仅发现两处，分别在武昌洪山和衡阳市南岳区。《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职方典》卷一二四二载：“衡山县，寿字石，字方广丈余，宋三山黄桂书”。

2012年10月19日，《湖南日报》报道衡阳市南岳区发现一个大型“寿”字摩崖石刻，“寿”字高3米余，一横长达3.1米，字迹端庄，笔法遒劲饱满，并刻意将“寿”字下方一点美化成“寿桃”模样，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

鉴于题跋内容和桃心“寿”字的分布情况，在武汉地区摩崖石刻的研究中，学界均认为洪山“寿”源于衡山“寿”。笔者参与撰写的《摩崖石刻见证武汉古代厚重历史》（《武汉文史资料》2021年第12期）就如此推测，而沈必晟、毛先唯在《武汉地区历代摩崖石刻述略》（《武汉文史资料》2019年第5期）中直接认为此“寿”字最早见于南岳衡山五华洞，凡是种种。

笔者经重新释读题跋内容，结合历史地理研究，认为武昌

洪山“寿”应早于南岳衡山“寿”。

题跋内容“有士大夫政和甲午岁游岳”，此“岳”不可简单理解为南岳衡山，应为高山之意。“见五华洞石壁上有寿字”，也不可直接作为南岳衡山五华洞。结合历史地理分析，南岳衡山未见有五华洞之说，而与“岳”相关的五华洞，全国见于两处：北岳恒山云冈石窟五华洞，江西五华山五华洞。而北岳恒山云冈石窟五华洞原指云冈石窟第9—13窟，约开凿于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完工于太和十三年（489年），至清代施以彩绘、异常绚丽而得名“五华洞”，与题跋所记北宋政和甲午游岳见五华洞的历史不符。

笔者经研究，更倾向于“见五华洞石壁上有寿字”中的五华洞，指的是江西五华山五华洞。江西五华山位于宜春市，始于唐代，兴盛于宋代。参考题跋下文“因刻石以传世，新定赵史君茂嘉复模于郡斋”，赵茂嘉为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人，曾任江西提刑。即有士大夫游江西五华山，初见五华洞壁有桃心“寿”字，后又鏊刻于江西某地，被赵茂嘉二次临摹的可能性极大。

衡山“寿”石刻右上方，有“三山黄桂书”



衡山“寿”石刻

款识，进一步佐证了衡山晚于洪山。按清代学者陈梦雷考证，衡山“寿”石刻为宋代三山黄桂所书。

黄桂（1190—1255年）字云卿，号春深，晚号荐藻。福州侯官人，曾求学于福州三山书院，始赐南宋嘉泰壬戌年（1202年）武举出身，南宋嘉定戊辰年（1208年）进士探花及第，官至太常少卿。

在宋代“三山”为福州别称，按《福州府志》载，南宋嘉定戊辰年（1208年），福州府侯官郑自诚高中状元，福清林德兴荣登榜眼、侯官黄桂获探花，一榜三鼎甲，全属福州人。

衡山“寿”石刻右上方题记“三山黄桂书”中的“三山”可能意指黄桂籍贯为“三山”（福州），也可指其出身于三山书院。按黄桂生平，其书刻桃心“寿”字，必在1190—1255年间。赵淳1195年篆刻洪山“寿”，若三山黄桂篆刻衡山“寿”在赵淳之前，即是为其不满5岁之作，难免与历史相悖。因此，洪山“寿”应早于衡山“寿”。

唐宋时期寿文化发达

纵观历史，中国寿文化源远流长。商周青铜器多有祝寿、祈寿之金文，孔子所著《论语·雍也》篇提出“仁者寿”，秦汉时期多行“三老五更”之礼，唐宋时期寿文化发展到一个高峰，诗词中多有祝寿之语，甚至于北宋徽宗有躬身朝拜南岳之举。

前文所提赵茂嘉其人，南宋辛弃疾与之交好，为其作诗祝寿《寿赵茂嘉郎中二首》。其一为：“玉色长身白首郎，当年麾节几甘棠。力贫活物阴功大，未老垂车逸兴长。久矣如今太公望，岿然真是鲁灵光。朝廷正尔尊黄发，稳驾蒲轮覩玉皇。”其二为“鹅湖

山麓湛溪湄，华屋眈眈照绿漪。子侄日为真率会，弟兄剩有唱酬诗。杨花榆荚浑如许，苦笋樱桃正是时。待酌西江援北斗，摩挲金狄与君期。”这在一定程度证明了宋代寿文化在士大夫之间的盛行，也间接印证了赵淳所刻桃心“寿”字题跋记载：北宋士大夫见桃心“寿”字而临摹，赵茂嘉二次临摹的可信性。

而南岳衡山自古有“寿岳”之称，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宋徽宗赵佶专程游历南岳，在南岳金简峰下留下“寿岳”两字石刻，每字四尺见方，大气磅礴。南宋黄桂书刻桃心“寿”字方广丈余，为南岳衡山迄今发现最大“寿”字石刻。加之武昌洪山摩崖赵淳篆刻“寿”字，由此可观寿文化在宋代的兴盛与发展。

摩崖文字承载了历史之厚重，洪山摩崖距今800余年，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史料价值。而桃心“寿”字体法独特，左下角一点作寿桃之状更添神韵之美，为以往之未见。由古至今书写“寿”字体法有百余种，而桃心“寿”字体法独特，端庄神韵，其发现为中国书法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

按赵淳所作桃心“寿”字石刻题跋，桃心“寿”字初见于北宋，在南宋得到了传承和发展。鉴于江西五华山五华洞未见有桃心“寿”字的历史资料和报道，现湮没于历史长河也未可知。而洪山摩崖“寿泉”中的“泉”字为后人增刻，所刻其人及年代暂不明确，有待于后续研究解开洪山摩崖的“寿泉”之谜。

张剑、宋贝，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馆员

倒口湖，岁月嬗替的故事

◇ 肖萍

曾几何时，倒口湖是我们十里钢城唯一的一处水上乐园，一处利用天然湖泊修建的大型露天游泳池。

1931年，长江洪水冲毁堤坝，在青山蒋家墩撕开一个大豁口，形成老百姓口中的“倒口湖”。此后，这一带葑草丛生、沼泽密布、人迹罕至，甚至留下一段时有土匪出没打劫商旅的“荒五里”黑历史。

1954年，武汉钢铁公司选址青山兴建，迎来从海南岛转战南北的开路先锋——解放军公路二师。这支队伍的首要任务，就是开辟一条自武昌通往青山的交通大动脉——武青二千道（和平大道）和通往厂前的冶金大道，其中五团在倒口湖安营扎寨。

倒口湖因长江溃堤而生，总是与历年防汛抗洪紧密联系在一起，每一次洪水袭来都是重点监控的险段，青山地区的防汛指挥部，也像守护神一样直接驻扎在倒口湖边。

最近一次重大险情发生在2016年夏天，武汉地区连降暴雨，

长江水位居高不下，倒口湖突发多处“管涌”。武汉市委、市政府紧急动员，千余军民迅速集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冒雨亲临现场指挥抢险。

这场抗洪抢险经媒体广泛报道，倒口湖一时“声名远扬”。

不过，倒口湖对于十里钢城长大的孩子来说，就是一幅自然天成的清丽画卷，一段欢声笑语的岁月足迹，一段不可复制再生的成长记忆。



2016年7月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倒口湖险段视察指挥

倒口湖露天游泳池，用架起的水泥栈道划分为儿童、少年和深水区三个游泳池。湖岸的树下，搭盖两间男女更衣室，简陋得连天花板都没有。记得第一次去游泳，是在小学五年级体育课上。一位当过兵的女体育老师，像赶鸭子一样把我们往水里赶。扑腾进儿童游泳池，湖水一波又一波涌来，吓得我一个劲儿抓住池边的铁管把杆，生怕一松手就会被湖水吞噬而去。终于听到老师吹起集合上岸的口哨，赶紧拼命一般扑上了岸。

如此令人心生怯意的倒口湖，在“停课闹革命”的日子，却成为钢城孩子们捞水草、捉蝌蚪、捕鱼虾、打水仗、寻觅乡间野趣的自由天地。

去倒口湖，要穿过一大片田野，那是和平乡生产队的蔬菜基地，一行行一垄垄青翠欲滴，长满瓜果蔬菜，红的是番茄，绿的是辣椒，紫的是茄子，白的是甜瓜，还有顶花带刺的嫩黄瓜、宛如翡翠的小苦瓜、长长垂下来的青丝瓜……

回想起来，那时候的孩子真是傻得可爱，到倒口湖游泳嬉戏，一泡就是大半天，可谁都不知带上一点馒头、饼子、凉白开充饥解渴。直到玩得尽兴，浑身疲软地从水中爬起来，这才残兵败将一般往家里逃。

烈日当头，饥肠辘辘，焦渴难耐，偏偏又遇上穿行蔬菜基地，五颜六色的新鲜瓜果蔬菜，就在眼皮子底下跳来跳去，真希望有一位好心的农民伯伯突然出现在眼前，豪爽大气地对我们说：“孩子们，游泳辛苦啦，快来尝尝生产队种的瓜果蔬菜吧！”可是睁大眼睛四下望去，明晃晃照得人头晕目眩的大太阳底下，连个人影都瞄不着。

我们好饿好饿啊，菜地就在小路旁，也没有任何篱笆，你想要吃什么，就可以尽情采摘什么，充充饥，解解渴，垫巴垫巴饿得



昔日倒口湖变身江湾湿地公园

前胸贴后背的瘪肚子，有什么不行？可我们这群孩子，居然没有一个伸手。

几十年过去，在我记忆的底片上，许多往事早已褪色，可是发生在烈日骄阳下的这一幕，却始终鲜亮如初。直到今天，我依然为我和我的同龄人弥足珍贵的“童真”所感动。

我想，来自心底的这份“坚持”，恐怕源于全国上下“学雷锋”的精神熏陶，源于少年英雄刘文学为保护生产队财产英勇献身的榜样激励，源于我们经常高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深刻影响，致使我们小学生也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经受了考验。

当倒口湖不再是昔日风光的时候，我曾独自徘徊于此且思绪绵长。年复一年，一些和我一样有着倒口湖情结的人，三三两两来到这里，包括随父辈支援攀枝花三线建设的孩子，从千里之外归来旧地重游，回味曾经的童年梦想……

就在我搁笔这篇文章的时候，偶然从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新消息——《昔日倒口湖，变身城市公园》。哦，倒口湖，看来你岁月嬗替的故事远没有结束，你依然活跃在持续不断续写的篇章中。

肖萍，武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原高级研究员